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三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一年九月

明代軍戶中的家人、義男

于志嘉*

明代以軍戶世襲衛所軍役，設軍政條例以規範軍戶戶內繼補軍役人選。對於軍戶常以家人、義男冒頂軍役的現實狀況，軍政條例中有禁令，也有妥協，總之以軍役的延續為第一要務。本文以族譜資料為主，衛選簿紀錄為輔，配合管見所及之賦役黃冊、保甲冊中對軍戶家人、義男的記載方式，力圖還原家人、義男對明代軍戶戶籍制度乃至家族結構帶來的影響。

關鍵詞：明代 軍戶 家人義男 戶籍 家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一般型研究計畫「明代軍戶家族研究 (1/2)」(NSC 98-2410-H-001-021-MY2)之成果報告。

一・前言

明代承襲元代的戶籍世襲制度，將戶籍大分為軍、民、匠、灶四類。各籍人戶皆世襲其籍，子子孫孫則各因其籍分別承擔不同的戶役。軍戶的戶役是軍役，戶內承擔軍役的人丁被稱作正軍。正軍執行軍役需離鄉背井遠赴政府指派的衛所，病故逃絕需由原籍勾取戶丁繼補軍役。為使軍戶能源源不絕的提供軍役繼補人選，政府規定軍戶不得分戶；同時訂定軍政條例，使負責清理軍伍的相關人員有所依循。清軍條例的內容是逐步積累而成的，現存最早的一部《軍政條例》收錄於《皇明制書》卷十二，¹ 其中包括宣德四年六月行在兵部尚書張本題准頒佈的三十三條、正統元年八月行在兵部尚書王驥奏定的十四條、正統二年計議事例十四條，以及正統三年計議的衛軍改調事例七條。由於衛軍的任務是保國衛民，政府要求由戶下精壯人丁繼補，實際情況則常有為規避軍役而以他人頂替者。《軍政條例》中有一款：

各衛所軍士有等殷實之家，本身并戶丁精壯不行應役，卻乃買求官吏，將買到軟弱家人、小廝并義女、使女招到女壻人等，冒名頂替，以致隊伍不精。又有頑民通同軍士變亂版籍，將戶下人丁過房典賣，招贅作壻，影射差徭。若有此等作弊之人，許令改正，男女歸宗。違者，官吏依律坐罪，正軍全家調發別衛充軍，頂替之人就收本衛補伍。如果正軍戶無人丁，方許將少壯義男并同籍女壻收補。仍禁約有司：今後勾解軍人，務要選取應繼壯丁，不許容情將所買軟弱小廝、家人、義女、使女招到女壻朦朧頂解，違者一體治罪。

此條例又見《明宣宗實錄》宣德四年（1429）八月癸未。² 但條例中的「義女、

¹ 《皇明制書》有許多不同版本，由山根幸夫，〈皇明制書解題〉（收入《皇明制書》，東京：古典研究會，1966，下卷），頁10可知，《軍政條例》僅見於十四卷本。古典研究會影印出版之《皇明制書》廣搜各版本內容匯為一編，由於卷數皆沿用原版本，因此有些錯亂。如該書上卷另有《孝慈錄》亦標作卷十二，《軍政條例》則收在下卷。

² 查《明宣宗實錄》（本文引用《明實錄》，黃彰健校勘，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捲影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57：2b-5b，宣德四年八月癸未：「行在兵部進勾軍條例。先是，遣官清理軍伍，定例十九條，至是復增例二十二條，通前奏請頒行。」其中所謂先前定例的十九條，分別見於《明宣宗實錄》9：8a-9b，洪熙元年（1425）九月癸丑；及同書36：1a-3a，宣德三年二月甲寅。前者收錄八條，後者十一條。

使女招到女婿」，實錄作「義女、女奴之夫」，亦可見這些家人、義男、女婿之屬，在國家的認知中，其實不過就是透過買賣行為獲取之奴僕。軍政條例禁止以義男、女婿繼充軍役，著眼點似在於這些價買奴僕多為軟弱不堪役使之徒，³ 正軍戶以之取代精壯戶丁，對國防治安將危害不淺。但對於正軍戶下僅存老弱殘丁者，為免軍役因無人繼承而空懸，仍是允許以少壯義男及同籍女婿收補的。這就顯示國家為求軍役延續，對軍戶內畜養家人、義男的現實狀況，是採取默認的態度的。

以收養義男、義女之名收用奴僕在明代社會本屬尋常現象，一般認為這與明代政府禁止庶民之家畜養奴僕有關。⁴ 也有學者認為與元代社會盛行使用奴僕有關。⁵ 然而，軍戶中的家人、義男、女婿，除去部分因貧賣身、乞養者外，由於軍戶之家可享有免除原籍、在營各一丁徭役的優免利多，有些民戶情願以過房典賣或招贅作婿的方式入為軍籍，藉以影射差徭。⁶ 這種作法對國家徭役徵收造成

³ 上舉條例之外，《皇明制書·軍政條例》12：12a-b，正統元年條例中亦有一條是針對「戶有壯丁，卻將老幼殘疾、家人、義男等項頂解」者做出懲處。言下之意只要頂解者是精壯家人、義男，戶下究竟有無壯丁並不重要，政府還是可以接受的。

⁴ 持此論點者認為，由於政府對庶民畜奴有禁，對勳臣、大員畜奴又有人數上的限制，為了防止觸犯刑律，官紳士庶之家不得不改變對奴婢的名稱，有稱之為義男、義婦者。如牛建強，〈明代奴僕與社會〉，《史學月刊》2002.4：98-107；蒿峰，〈明代的義男買賣與雇工人〉，《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科版）》1988.4：107-113，83；韓大成，〈明代的奴婢〉，王仲荦主編，葛懋春編輯，《歷史論叢》第4輯（濟南：齊魯書社，1983），頁272-303；高橋芳郎，〈明代の奴婢・義子孫・雇工人—萬曆十六年新題例の前提—〉，《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中國の傳統社会と家族》（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107-127。

⁵ 周良霄，〈明律“雇工人”研究〉，《文史》15（1982）：75-90，即指出：元代於「典雇之外，又廣泛地利用過房、乞養、入贅等方式取得變相的奴婢。當時的養子、義男、贅婿等的法律地位是大體與雇身奴婢（雇身人）相當的」。而明朝「政府規定庶民之家雖然不可以畜奴，但可以使用“雇工人”。此外，他們還可以“義男女”之名收養人口，通過這些以補充、滿足庶民之家對奴婢使用的現實需要。因此，明代奴僕之風仍然盛行」（頁84-85）。

⁶ 如《明宣宗實錄》108：11a，宣德九年二月戊辰：「直隸蘇州府知府況鍾言：崑山縣民有欲脫漏戶口，避徭役者。往往貨賄太倉等衛官旗，妄認親屬、義男、女婿之類，追取赴衛，實不當軍。俟再造黃冊，復以老幼還鄉，於別里附籍帶管。原戶賦稅，累鄰里代償。乞令各衛有如此者，許自陳改正」。與此相類的情況亦見於灶戶與匠戶。許文繼，〈「義男」小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4：101-104，頁104指出，明初灶戶因可享有優免田地，有民戶為逃避國課，假借義男、贅婿名目，避入無田灶戶者。又有鄉里小民為避糧差，冒作匠戶之義男、女婿，隨匠戶赴京開設店鋪，代與領牌上工者。許氏認為，這

實質傷害，自為政府所不容，因此要求他們自首歸宗，違者充軍。也有旗軍逃回原籍，或詐稱病故，或更改姓名，投入「豪強勢要官員軍民之家，作家人、伴當、看莊、種田等項名色」，這種行為更直接減損執行軍役者的人數，政府因此對不肯出首改正者，處以「逃軍發邊遠充軍，里鄰窩家人等照依隱藏逃軍榜例問斷」。⁷

另一方面，衛所武官畜奴是國家授予的合法權益，萬曆《大明會典·刑部·抄劄》卷一七八：

（洪武）十七年，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就解本處衛分。成丁男子同妻小收充軍役，其餘人口給與軍官為奴。⁸

可知其來源部分為抄沒犯罪人口。另外，「洪武、永樂、正統年間從征靖難，收捕夷虜賊寇等項獲到男女」，亦皆給付武官，「作為義男、家人、使女」。⁹ 這些罪犯或戰俘，由國家賜與武臣為奴，具有「賤民」的身分。¹⁰ 各級武官得畜養

一類的義男「兼有養子與奴僕的雙重身份」。配合本文所論軍戶的狀況，正可突顯出義男在特殊戶役戶中有其特別之存在意義。

⁷ 參見《皇明制書·軍政條例》12：3a，宣德四年條例。

⁸ 又見王圻，《續文獻通考》（二五四卷，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曹時聘等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類書類》185-189，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20：1249，〈戶口考·奴婢〉。

⁹ 參見楊一凡主編，蔣達濤副主編，《皇明條法事類纂》（《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4-6，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3：94-100，〈名例類·禁約投托各邊鎮守守備等官為家人義男及所屬官將家人義男送與各官交結等項例〉。

¹⁰ 這一類法理上屬於賤民的奴婢，來自抄沒犯罪人口及戰俘；他們的良民身分，乃是因國家權力而被剝奪。高峰，〈試論明代奴僕制度〉，《烟台大學學報（哲社科版）》1989.1：89-94，頁89稱之為「經典的奴隸」。高橋芳郎，〈明代の奴婢・義子孫・雇工人〉，頁107-108，則從法理上身分地位的不同，來區分奴婢、義子孫、雇工人，將「奴婢」定義為「合法的私的隸屬民」。關於戰爭俘虜，王圻，《續文獻通考·戶口考·奴婢》20：1249有云：「國朝軍中俘獲子女及犯罪抄沒人口，多分給功臣家為奴婢」。對此，高橋芳郎，〈明末清初期、奴婢・雇工人身分の再編と特質〉，《東洋史研究》41.3（1972）：60-85，頁62特別指出，明律中並不存在以俘虜為奴婢的規定，現實中奴婢化的主要途徑是犯罪沒官，因此在各種明律的註釋書中，都只說奴婢是犯罪緣坐之人，從無提及俘獲奴婢者。高橋之說容易引發誤解，以為明朝並無以戰俘為奴之事實，但除註9所舉例之外，如尤鼎等修，尤雲章纂，《尤氏閩浙蘇常鎮宗譜》（據清乾隆四十八年遂初堂刻本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42，北京：線裝書局，2002），第三冊，〈萬柳溪邊近話〉，即記丁巳於「洪武初以劉基薦，召對稱旨，除閤門使。上嗟其敬謹，數賜飲膳，擢祠祭員外。應詔陳言，……皆規切時政。上嘉納之，賜俘一人」。王圻，《續文獻通考·戶口考·奴婢》20：1249在上引文後也接著說到：「至萬曆二十九年，兵部奏逆

奴婢人數雖不詳，但從洪武二十四年對勳臣及三品以上大臣「役卑奴婢」，限定「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¹¹可以推知其法定人數不會太多。唯明代衛所武官亦屬世職，永樂以前或有因調動頻繁，不時改動屬衛者；洪熙以後，世襲武官大多長期屬於同一衛，與世襲衛軍之間常形成私的隸屬關係。¹²例如，衛所雜役中有所謂的「軍伴」，本為武官法定隨從，由正軍三日一更直。洪武二十六年禮部奏定其人數：「一品至三品六人，四品至六品四人，七品至九品二人」；二十九年降為「指揮使至僉事四人，千戶以下人三人，百戶以下人二人」，仍每三日一更，「下直則歸隊伍操練」；實則多淪為武官私役的對象，不僅人數超額，甚且役及餘丁。¹³加上屬官

酋楊道漢等，奉旨分給功臣王承勳、徐文壁等家，仍遵前旨嚴加約束，不許婚配」；其事見《明神宗實錄》361：6b，萬曆二十九年七月戊申：「命發遣播州人張世爵等為甘肅遼東極邊衛所永遠充軍，楊勝棟及妻田氏等分給功臣家為奴，仍嚴加管束，不許婚配」。俱可見以俘虜為奴婢之事確實存在。

¹¹ 參見林堯俞等纂修，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一百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97-59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7：275-1，〈儀制司職掌·官員禮·官員儀從〉。

¹² 參見于志嘉，〈從衛選簿看明代武官世襲制度〉，《食貨月刊》復刊 15.7/8 (1986)：30-51，頁 47-48。文中引《明世宗實錄》196：7a，弘治十六年二月庚戌：「一、清隱占。遼東總兵、副總兵、參將、都指揮、千戶等官，先年各選驍勇軍士，隨從殺賊，久之遂為家人。其陞調官員，則有帶去軍丁見在世襲子孫；有任參將以下者，一家有十餘姓，一姓有十七、八人。又有隱占軍丁從嫁使令者，見今一家多者有二、三百丁，俱稱舍餘，不當差役」。衛所武官役占軍餘的情況非常嚴重，例如南昌衛，陳有年，《陳恭介公文集》（十二卷，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陳啓孫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352-135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14b-23b，〈酌議軍餘丁差以甦疲累事疏〉即云：「該臣等會看得：衛所武弁，承遠祖之功勳，竊清朝之祿位。一籌未展，既安享章綬之榮；方寸有知，當勉圖涓埃之報。夫何纔濫貂續，即肆狼貪。假耳目於奴僕，恣魚肉於軍人。或侵奪屯田而冒其糧餉；或濫役軍丁而勒其錙銖。甚有一官而包占數十卒，宴會酒席，坐之軍吏；祭祀儀品，派之餘丁。凌虐迫于妻孥，驅使及于童稚。商不得行貨，農不得服耕，學藝者令其赴工，習讀者強其去業。由祖及孫，世屬其奴隸；自少至老，日伺其門庭」。萬曆《南昌府志》（范涑修，章潢纂，三十卷，據明萬曆十六年刊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810，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9：17a，〈軍差〉亦云：「國初正軍歲力操守正役，餘軍止聽繼爾。嗣是遵貼正軍，又嗣是輪有司草料。然而未有徭也。今徭之派，若重困之矣。乃欣欣然如解倒懸，曷故哉？緣武職世襲不易，故軍戶世被役占，亦勢所必至者」。

¹³ 參見于志嘉，〈明代江西衛所軍役的演變〉，《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168-171。

有為巴結上官贈送義男、家人者，衛軍亦有為躲避差使自願帶丁糧投靠者，¹⁴ 這些都使得衛官家人數量居高不下，嚴重影響實差軍役人數。

對於這些出於不同原因或目的成為軍戶家人、義男者，軍戶家族究以何種方式來應對，家人、義男對軍籍維護的貢獻又如何，過去我們大多只能從奏疏、文集中瞭解其大概，鮮少以族譜資料進行的家族個案分析。筆者利用族譜資料研究明代軍戶近三十年，¹⁵ 初時受限於收藏地點分散，又難以分辨何者為軍戶家譜，查找時猶如大海撈針，徒勞無功者居多。二〇〇〇年上海圖書館出版《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書中節錄各家族始遷祖遷徙原因、遷徙地點，間亦摘要族譜中出現之重要內容，乃得以藉之過濾出軍戶及衛所武官家譜，雖疏漏在所不免，但能將閱讀範圍限縮在軍戶相關族譜，效率較前已大幅提昇。二〇〇八年上海圖書館復又出版《中國家譜總目》，收錄範圍擴大到全世界各大主要圖書館兼及部分私人藏品，雖因部分圖書館未能配合提供提要資訊，以致個人之過濾工作不夠確實，但因上海圖書館館藏族譜經此數年之重點收藏，數量已居全中國之冠，其中亦不乏他館藏品之複本，讀者可藉由版本之比對，瞭解他館藏品之部分狀況，其學術貢獻不容忽視。另一方面，族譜的出版方興未艾，應運而生的《中國譜牒庫》相信更可推動族譜資料在學術研究上的運用。本文即在此基礎上，從歷年所得中，選取三部存留有較多關於家人、義男資料的族譜，集中探討家人、義男在明代軍戶家族中的角色地位。同時輔以衛選簿及管見所及之賦役黃冊、保甲冊中對軍戶家人、義男的記載，期能還原家人、義男對明代軍戶戶籍制度乃至家族結構帶來的影響。

¹⁴ 參見註 9。武官私役軍士以及逃軍投托武官的情形，又可見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272-273, 286-287, 305-312。

¹⁵ 已發表論文主要有〈試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4 (1986)：635-667；〈再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幾個個案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 (1993)：639-678；〈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戶遷徙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 (1993)：135-174；〈明清時代軍戶的家族關係——衛所軍戶與原籍軍戶之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1 (2003)：97-140；〈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頁 80-104 等篇。

二・軍戶家族個案研究

(一) 安徽桐城含山伍氏

含山伍氏以伍克明為一世祖。伍氏世居安徽婺源。始遷祖伍恭，於元朝中葉由婺源遷廬州路無為州石子岡，¹⁶ 生子泰六。泰六生四子，長子克明，行名通一，由無為州再遷安慶府桐城縣；餘三子通二、通三、通四仍居無為州。

克明係元代明經博士，因世亂忘懷進取。及明太祖平定天下，徵逸士，有司以其名上聞，克明堅辭不肯出，乃遁跡於桐城之東。《伍氏宗譜》卷二，〈含爽山股之由〉記其覓地遷居始末：

攜家人二潘一孔至桐。見其山起跌活潑，盤旋飛舞，有生龍活虎之態，泔泔清流，紆迴曲折，縵遠而不竭，慨然曰：誠勝地也。低徊流連不忍去。從者曰：山水佳，田地狹隘，不可為不拔之基。由邑而東，抵麻埠河，宿居人吳君家。吳君，有道君子也，相得甚歡，薦蔬黍之供，劇談竟夕。明日，送公渡河，指其處曰：此地可居，曷識之。公曰：諾。別吳公南行，至一小鎮，曰白陽街。西望一山，聳然屹峙，湖水遶其麓，遂詣其處。遇一土著詹姓者，詢曰：茲何山也？曰：山無名，居人以其多兔，遂曰兔兒山。公哂之，居何氏？曰：無也。行數十武，見其平衍寬敞，峰巒拱峙，水聚天心，風景蒼古，儼然武陵風味。語從者曰：是殆可居。又前中一高坡，地更廣平，面峰屹拱，水面印浮。公周視而額之。循河而西，止其山下，有居人祝氏，新來安插者也。主於其家，商所插之處。祝云：吾力微，不能召人佃墾。指所望一河兩岸，皆其曠土，若有力，任君插報。於是遂立業於此山之下，東至鍋匠衙，西至本山西天河，南至茶林橋，北至兔兒山。命潘、孔報縣註冊，後人遂稱為含山伍氏云。

伍克明選定兔兒山下作為開基立業之址，除了沿途問訊所遇居人，聽取相關情報外，隨行的三位家人也適時提供意見，終於覓得開闢的基地。顯然，他所插報的

¹⁶ 按：《伍氏宗譜》（伍受禔等修，清同治七年思遠堂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縮微膠捲），首：20a-26b，〈重修宗譜序〉，謂伍恭由婺源遷無為州；同書 20：1a，〈遷祖道慶公傳〉，謂伍恭由江西鄱陽遷無為州；3：1a-b，〈含爽山股長房小傳〉，又謂伍克明「自廬之無為州石子岡遷桐。祖籍蘇州，寄籍江西鄱陽」。或由婺源一旦寄籍鄱陽再遷無為州亦未可知。不詳，待考。

于志嘉

是無人墾種的曠土。《伍氏宗譜》卷二四，〈軍族篇序〉記元末桐城一帶荒廢狀況：

元季寇戕兵害，田園荒為曠土，墳塚踰為平地，數十里無炊烟，無人跡。

間有萬死一生者，合邑中僅二三十人。烽火漸熄，招徠安插，人稍集焉。伍克明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入籍桐城。在他之前，先有祝氏前來安插；伍克明相中附近荒地，也禮貌性的先徵得祝氏同意。待開墾範圍確定後，隨即命家人報縣註冊，從此取得合法身分，名下擁有一筆不小的田地。

伍克明生一子，名貴，行名元七，字惟良。洪武十五年（1382）由科舉擢都察院四川道監察御史、工科都給事中。¹⁷ 伍克明遷居桐城，伍貴與家人同行，¹⁸ 後不幸落入軍籍。《伍氏宗譜·軍族篇序》云：

洪武初，忽命指揮使下州縣抽丁當軍，……本縣提調官親見人民鮮少，誰可抽去？然新天子初政，何敢違？不得已，屬合邑有力戶口，集庭商議，僅以十餘人報名回旨。注於冊，曰軍籍。邑中稱之曰上戶，民、匠二籍不德〔得〕與之齒。然虛名也，而實受其害矣。……我二世祖（伍貴）在所商抽當之列，所生五子，豈能從軍遠行？幸家人子名來興，年方冠，有血性，且忠誠，臂力過人，願代主往。

明初因統一事業尚未完成，需軍孔急，常自州縣中抽取人丁充當軍役。其法有多端，¹⁹ 當時桐城一地乃是集合縣內有力戶口，以合議方式推派充軍人選。伍貴既在眾人合議名單中，所生五子不願遠行，²⁰ 只得以家人子來興任役。來興後以軍功授守備職，至正統年間病故。子執虎承父職，弘治十年（1497）故。因無子嗣，於弘治十三年由大羅衛發文到縣勾補。

來興為含山伍氏「家人子」，其所出《伍氏宗譜》不載，不得其詳。但伍克

¹⁷ 參見《伍氏宗譜·含山股長房小傳》3：3a。

¹⁸ 參見《伍氏宗譜·重修宗譜序》首：20a-b。

¹⁹ 參見于志嘉，〈再論垛集與抽籍〉，《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頁197-237。桐城屬南京安慶府，同屬安慶府的太湖縣在洪武四年曾有垛集事例。無為州則更早，在丙午年及吳元年都有垛集軍的事例。見前引文附錄一〈衛選簿中所見垛集軍資料表〉，74：182（以上太湖）；56：279、64：74、65：331、65：395、74：374（以上無為州）。

²⁰ 伍貴年過四十始得子，或於抽軍時諸子年尚幼，不捨其遠行。參見道光《桐城續修縣志》（廖大聞等修，金鼎壽等纂，二十四卷，首一卷，據民國二十九年重排印清道光七年刊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242，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17：18a，〈人物志·篤行〉。

明另有家人「二潘一孔」隨同創業，此三人日後在伍氏宗族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伍氏宗譜》卷二〇，〈二世祖惟良公傳〉有云：

先是，太公遊歷時，有從者三人，二潘一孔。太公遇之甚厚，遺命謂：若輩事吾忠謹，後當勿以僕視之。太公卒，公皆放出，令各復姓立門戶，永不呼役。且各賜居廬一區、田種八石，成父志也。

同書卷二，〈含爽山股之由〉又云：

傳至二世祖惟良公，生五子，因軍民兩差繁重，將先公隨來家人二潘一孔放出在外，各撥田一十八担，姓伍姓，當伍姓差役。我三世祖兄弟實未分也。至老年，始析箸，各領一莊。

似乎伍貴在伍克明死後，一度遵照父親遺命，放出三位家人使「各復姓立門戶」，但在來興赴衛以後，唯恐軍民兩差難以維持，復又召回三位家人，使之「姓伍姓，當伍姓差役」，並於原所撥贈居廬一區、田種八担之外，各再贈與田種十担，讓他們與自己所生五子享有同樣多的田產，一同分擔差役。²¹

伍貴所生五子，是即仕貞、仕迪、仕遴、仕邊、仕賢。伍貴分產時，乃是「將所有田產，除祭膳田外，品作八股分授」；也因此，「凡一切差事，八股輪執無異」。天順年間，八股尚領有合同議約存據，但因軍役尚由來興子孫承擔，伍氏並無軍差負擔。及弘治十年來興一支絕嗣，十三年大羅衛來文勾取戶丁伍鼎解補，此後「屢年回家需索軍裝」，軍裝從此成為伍氏必須面對的差役負擔。

嘉靖三年（1524），伍鼎病故，子伍元承後補伍。嘉靖八年，伍元復來討索軍

²¹ 按：傅衣凌、陳支平，〈商品經濟對明代封建階級結構的衝擊及其夭折——讀惠安《駱氏族譜》兼論奴變性質〉，《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頁 1-16，介紹惠安駱氏在大約宋末元初之際，自光州固始避亂入閩，其肇基始祖必騰公即以隨遷養男黃來保、楊成安、朱長安等，「俱收入籍，共支戶役」。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124，以嘉靖年間同安縣縉紳林希元所作《家訓》為例，說明林氏養男與嫡系子孫共同繼承里甲戶籍，「實際上已被視為家族成員」。俱可見伍氏以家人入籍，在當時絕非特例。所不同者，黃、楊、朱三姓之於駱氏，始終維持「封建的依附關係」，擔負著「祭祀執役和奉送牲紙的傳統活動」；一直到嘉靖、萬曆年間才發生異變。其中的黃姓世僕由於經濟、社會、政治地位的提升，不但片面斷絕了與駱氏的主僕關係，同時通過擅刻先人墓誌、修纂自家族譜等途徑，冒為駱氏大宗，成功取得地方縉紳的認同。相對於此，二潘一孔自始即以戶股的形式入籍，與伍貴五子享有同等權利義務。伍氏與二潘一孔的關係或為特例，但此種特殊關係的形成，與伍氏面對之軍差重役確有極大關聯。未來仍需累積更多個案，期能究明軍戶家人義男在戶族內的身分地位。

裝盤費，伍氏宗眾因「見前輩亡多存少，誠恐潘孔子孫年深月久，負我祖盟，以各姓為別，不遵約束，有失軍民兩項大事」，於是「鳩集八股人等」，重新訂定合同議約。《伍氏宗譜·軍族篇》，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軍裝合同議約〉記其事：

寫立合同二帋，稟官請印。軍領一帋，本戶一帋，本年每股出銀六兩一錢五分，共銀四十九兩四錢四分，付軍人領訖。嗣後軍人子孫回家，執此合同對照，盤費照前辦給，本戶不得扣減，軍人毋許過取。倘或勾丁解補，費用八股公出，八股子孫毋得生端異說。如有此等戶股，執此赴公。恐後無憑，立此合同二紙，永遠存照。

由之可知，伍貴五子與二潘一孔之子孫始終共為一戶。嘉靖八年簽訂合同議約時，戶下八個「戶股」各派出一名代表，是即「立合同議約人」伍瓊、伍憲、伍鐸、伍隆、伍夔、伍潘玉、孔賢、潘榮等八人。²² 議約內容完全針對大羅衛軍役，包括現役軍人前來索討之軍裝盤費，以及將來一旦軍役出缺，勾丁解補所需之額外用度。又因伍鼎解補後每次回家需索軍費「多寡不一」，新訂合同議約中也議定額數，每次供銀四十九兩四錢四分，²³ 由八股均攤。議約之後，所立合同報官請印，除了藉官方之力維護衛軍與「本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更重要的是經由官方認證，將二潘一孔三戶股牽制在伍姓戶族內，強制彼等與伍姓五股一體出辦軍差。這也可見官府對於二潘一孔附籍在伍姓戶內當差一事是毫無異議的。

萬曆二年（1574）二月十五日，伍偉、孟春、謨、學詩、宗禮、潘棟、孔堂、潘儀等八人再立〈置軍莊田種合同議約〉。原來自嘉靖八年立約之後，伍氏在伍榔為戶長時遭「八股隱匿田畝八畝，清查不出」；復於伍儒任戶長時「又匿田畝八畝八分」，兼之「八股廢興不一」，「有孤無後裔，貧無立錫者」，以致原定八股每次均攤軍裝銀六兩一錢五分之議難以達成，民賦、民差亦供辦困難，於是經戶眾商議，於萬曆二年每股各出銀三兩五錢，外加伍宗堯捐贈之賣田價銀十五兩，共湊成四十三兩，買下伍東周原買自孔方莊所田種三担六斗五升，及附近山場園圃樹木屋宇基址等，「同眾召到有力人在上住種看管」。每年秋租二十

²² 從「立合同議約人」的姓名來看，似乎二潘一孔中僅一潘冠伍姓，其餘仍舊姓；但從萬曆二年〈置軍莊田種合同議約〉來看，伍潘儀之外尚有伍孔堂之名。姑不論平日如何稱呼，至少在應賦役時是冠伍姓的。

²³ 合同議約中並未說明伍元是否年年返家，所謂「四十九兩四錢四分」究竟是一年的額度抑或一次的額度也無從判斷。但因其後萬曆四十四年與伍日誠所定之議約係以三兩三錢為年額，姑斷為久久一次返家時領取的額度。

五担，將其中十担「捱次付股」²⁴ 領收放利，回收時「照加四額利，輪流交接，聽辦軍費」。其餘十五担則由輪管賦役人收作採辦之費。「如租不足所用，公議隨條編照子丁派收，以補管役人湊用」。

也就是說，新議定的方法不再於軍人返家時才臨時向各股收取銀兩充作軍費，而是由八股一次性的提交買田價銀，將所購得之田產充作「軍莊」，再以軍莊秋租供應軍民兩差。軍莊田不屬於八股中之任何一股，佃種看管者需經族眾合議決定；每年租銀除民差銀由戶內輪管賦役人收辦外，軍差銀在軍人未歸時提供族人借貸取利，並逐年由各股輪流管理，依序交接。由於軍莊田的收入有限，軍差銀的支出固定，但民差銀則時因官府於「額差外有新增重大差事」，不得不增加支費，因此萬曆二年議定的〈置軍莊田種合同議約〉，對於民賦民差的分派著墨最多。購買軍莊田所需的銀兩，在扣除伍宗堯個人的捐贈後，由八股平均分攤；但在軍莊田置買之後，考慮到八股廢興不一，決定：

併作五股當差，接官賦役。伍求、伍孔堂一股，伍儲、伍潘儀一股，伍宗禮、潘棟一股，伍日元、伍偉照前各當一股。原冊內包賠朱老兒、陳元壽二絕，並前無頭冤畝二十八畝八分，原本戶賠納，今散作八股分領，每股二畝玖分。實受已串當差八股人丁，不分見丁，著實出費。議定三年一查，已冠者當上丁，六十者開免，為定額。每年各股頭照丁畝彙齊，付管賦役人完納。秋糧照田每畝一斗零八合起科，本折俱約限十月彙齊送交，不得致累年頭。倘額差外有新增重大差事，合族另議。凡遇糧里，照前合同，公議的當人承充，毋得混爭。恐後無憑，立此合同議約，各收存照。

這一份合同議約，約束的對象是戶下八股人丁，與大羅衛軍無關，因此不需交付軍丁收存。值得注意的是，八股人丁在「接官賦役」時雖是併作五股當差，但在

²⁴ 原文謂：「將十担捱次付股領放，收照加四額利，輪流交接，聽辦軍費」，語意不明之處甚多。比較可能的解釋是，自軍莊田設立之後，每年收租之時，將秋租十担交與當年輪值之股，以一年為期，期間股頭得以四成利放貸戶眾。若軍人來取，股頭負責交付軍費。否則於次年合本利移交值年另股。由於每年都有新租十担，若軍人久久才來一次，當可累積相當數額，足以應充軍費。至於軍費額度，〈置軍莊田種合同議約〉並未提及，但因該議約僅以戶下八股為對象，並未經衛軍和議，不可能自行修改數額，因此應是遵循嘉靖八年舊約，仍為四十九兩四錢四分。唯「捱次」交付之股，究為舊八股抑或新五股，仍難斷其詳。從議約內容先後順序看，首言八股均出銀買田，次言軍費銀「捱次付股領放」，再言以餘租及丁銀供賦役，然後才提到八股「併作五股當差，接官賦役」。至於過去由本戶賠納之無頭冤畝，則仍「散作八股分領」。似乎只有在應充差役時才以五股分擔，其他事務包括軍差銀的經營則仍由八股輪流分管。

賠納絕戶田及無頭冤畝時，卻又將田額依然散作八股分領。或許是因為八股當年自伍貴分得的田產數額相同，因此不論日後人丁盛衰，各股對按畝輸納的秋糧尤其是被迫包賠的絕糧始終負有同等義務，僅在按丁出辦的差銀上酌有增減。此外，軍差銀的經營管理似也維持八股分管的形式，或與軍差銀來源清楚、數額固定，比較不受各股勢力強弱影響有關。從八股合併的情形來看，二潘一孔分別併入伍姓三股，亦可見這三位家人後代的發展，相較於伍姓五股確實是比較弱勢的。儘管如此，二潘一孔「附伍姓當差」的局面始終不曾改變，對軍民二差所擔負的責任也始終受到伍姓的制約。

萬曆四十三年，大羅衛軍人伍尚文故絕，舊有合同隨之自動失效。但含山伍氏也不可免的再度面臨被勾補的命運。經合族商議，「有長房子丁伍日誠兄弟議定，自情愿前去補伍」。萬曆四十四年九月初二日，遂由戶長伍東流出面，與伍日誠兄弟再立〈軍裝合同議約〉，約中規定：

五股公出銀一百兩整，與日誠娶妻及路用盤纏、到衛安家之費，日後子孫永遠承充，不得失誤公事。比議，嗣後每一年出軍銀三兩三錢整，俟軍人回家取費，不拘遠近，五股照派出備，毋許推脫扣減。軍人亦不得倚軍別生事端。此係心愿，並無逼勒等情。恐後無憑，立此合同一樣二帋，各領一紙，永遠收執對照。公議日誠回家祭掃，衣服不拘遠近，五股公備銀二兩五錢與用。又照。

新立合同約定，伍日誠於首度赴衛之時，得領取五股公出銀一百兩。此後以每年三兩三錢為度，於軍人返家時由五股計年照派給發。軍人另可於回家祭掃時額外獲得銀二兩五錢的補貼，用以備辦衣物，此項銀兩亦由五股均攤。伍日誠子孫此後在衛繼承軍役不缺，萬曆四十四年議定的合同也一直持續到清初「詔免天下戍役」後仍為含山伍氏遵守不渝，²⁵ 唯雙方實際往來情況不詳。

萬曆四十四年議定的合同不曾提及萬曆二年購置的軍莊田有何變化。《伍氏宗譜》卷十六，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十五日立〈墓田議約〉謂：

明萬曆四年，合族公買孔方荒冲田種叁担陸捌伍升，租貳拾伍担，以備軍需。本朝聖恩免役後，其田遂五股瓜分，據為私有。竊念此田原係祖上公

²⁵ 《伍氏宗譜·軍族篇序》24：2a 有云：「本朝中外一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詔免天下戍役，恩戴無疆。但我軍之在彼處，自成一族，固我祖血屬也，何忍忘。況彼先世勤勞王事，雖為祖，實為族人也。倘後子孫回家，文券符合，定當相認。如不合，即是拐騙匪人，當詳慎核之。」

置，仍合為一，以為二世祖墓田，豈不甚善？第麻溪北股田良士賣與大公中，然大公田即二世祖田也，無庸議；惟秀東股田泗水公無子，賣與爽長房，爽長房轉賣與秀西股鵬萬，今徵明是其子也，公中理論，回贖以成完璧。……今徵有憑，立此議約，鐫刻二世祖墓蹟末，永遠為據。

可知在入清以後，隨著軍役的廢除，一旦遭五股瓜分；至乾隆十九年才又經合族公議，「回贖以成完璧」，用以充二世祖伍貴之墓田。似乎軍莊田租自萬曆四年以來一直被用作軍費的來源，只是無法從萬曆四十四年的合同議約中看出其後之運作模式。唯一能確定的是，軍差銀自萬曆四十四年以後改由五股分攤，明初以來二潘一孔的後代仍被納入五股之中，持續為伍氏戶役貢獻出心力。

（二）蘇州常熟南張氏

常熟南張氏以張佺（景仙）為一世祖。佺於元末自閩遷虞（常熟），死後仍歸祔祖塋。妻匡氏，生二子，次子早亡，長子張左，字君輔（又作均輔），號樂常。左妻薛氏，生子三，億（順寧）、儀、脩。至正二年（1342），薛氏年十九，舅姑相繼歿。後值張士誠蹂躪江浙，常熟被兵，張左「少遭艱阻，惟以訓蒙賣藥為生」，後來倒也逐漸累積了些許田產。²⁶

張左與三子原本「同居共業」。洪武四年申報戶籍時，張左與張億父子住在關西南隅，張儀同弟張脩則住在關四十四都。洪武十四年，四人各自分立戶籍。十八年（1385），張左「為李榮三告吏役事，全家抄發。因男張億各籍，止抄張左當房家小，問發金齒衛充軍」。²⁷ 同年正月十五日，張左將手中握有的屋、地、什物，除少部分存留給妻子外，其餘「通行配勻，分作東、中、西三段」，由三子各自挑選一段繼承。

《南張世譜》存有〈樂常公分撥親筆〉。據其所述，張左其實在此之前，就已將平生所置業田，「具標撥文字一樣三本」，交給三子各執一本存照。惜「標撥筆據，而今已不得見矣」。第一次標撥的時間不詳，但很可能就是在父子四人各

²⁶ 參見《南張世譜》（不分卷，據清乾隆間刻本影印，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39，北京：線裝書局，2002），第一冊，〈始遷常熟州考〉、〈景仙公墓辨〉、〈匡孺人母族考〉、〈樂常公分撥親筆〉。

²⁷ 參見《南張世譜》第一冊，〈充軍文冊〉。「李榮三告吏役事」內容不詳，但洪武十八年正是朱元璋重典打擊貪官污吏的時候，也是《御製大誥》頒行之年，參見楊一凡，〈重典治吏考〉，《洪武法律典籍考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頁105-115。

立戶籍的洪武十四年。第二次分撥，則是為了要處理前次未曾定奪之屋、地，以及其後續置之江地、邢地。〈樂常公分撥親筆〉載有三子分受屋、地的細目與四至，以長子張億為例，他選擇分受的東段，擁有正屋東向一間一舍、東屋一間一披、東段續置江地并隨屋周圍空地等。東、西、中三段之外，另有存留給薛氏的草房五架一間、用來營種樹株的租賃抄沒地三分，以及若干什物，指明於親歿後由三子分用。這本是張左在充軍前為保留大部分財產不致被抄沒所做的脫產動作，²⁸ 沒想到卻成為日後被追查的對象。

張左充軍，被判「全家抄發」。《南張世譜·觀復公遺囑》記同行之人：

祖於洪武十八年……充軍。有男張福三、張演住，隨營當軍。原籍止存妻薛氏。

觀復公即張衡，為張億長子。張左充軍時，因已與三子分立戶籍，戶下並無親男。與之同行的張福三、張演住二人，雖以「男」稱之，實非薛氏所生，乃是以義男身分隨往。此一安排，由於張億分籍在前，完全符合「止抄張左當房家小」的規定。不料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因監察御史「清理文卷，查出舊案」，不但「將本戶家財抄沒入官」；牽連所及，張億與長男張衡更在洪武二十五年及三十年，先後以侵佔「沒官房屋」罪名，分別問發鹽井衛及留守右衛充軍。可以想見洪武十八年張左被判充軍時，名下所存財產本應一併充公，張左為子孫計，臨行分產，卻弄巧成拙，反而為子孫帶來無窮後患。〈觀復公遺囑〉記此事：

父（億）於洪武二十五年為沒官房屋事，問發鹽井衛充軍。有男張保住隨營。病故，復勾男張經補役。洪武三十年五月，蒙差郭御史到縣清理前事，照卷提取。原申保給〔結〕不明，父先為此事充軍不在，本縣將我提解，不容分理，又將我問發留守右衛充軍。後因軟弱不堪征操，告將男張驚福代役。

原本張左充軍，戶下只有一名軍役；未料因護產心切，反而額外牽連出兩名軍役，明初謫充軍役之濫由此可見。

張億於洪武二十五年問發充軍。赴衛時隨帶男張保住前往。張保住死後，又由原籍勾取男張經補役。保住與經皆非張億親生，應該也是義男之屬。至於張衡，他在洪武三十年因「牽連沒官房屋事回申差池」，「送問解都察院發留守右

²⁸ 張左在分撥親筆的末尾賦詩一首，有「省心兼足保身家，子子孫孫永為計」一語。參見《南張世譜》第一冊，〈樂常公分撥親筆〉。

衛充軍」，²⁹ 原本親身應役，後因體弱不堪征操，改以義男張驚福繼役。

張左於洪武三十五年（1402）二月病故，其妻薛氏亦於永樂元年（1403）二月病逝。³⁰ 永樂元年適逢重造黃冊，³¹ 因係丁盡戶絕，遂於黃冊開除戶籍。不過，張左名下的軍役並未因此了結。〈觀復公遺囑〉續云：

永樂六年，雲南都司填兵部陪字六十五號勘合，批差總旗劉玉等，為勾補軍役事，坐下故軍名字來勾。將父（張億）解縣。供說有叔張左，係是另居各籍，洪武四年給戶部二十號戶帖一道，造冊報籍；父自有原給戶部二十一號戶帖，并遞年黃冊為照。況本戶自有男張經等鹽井等衛當軍三名不缺。

張左既已絕戶，其軍役無人可繼，日後清勾時當以絕戶結案；可是到了永樂六年，雲南都司派差前來常熟坐勾屬於張左名下的軍役，卻將張億解縣。原來這時張億已經回籍居住，其鹽井衛軍役由義男張經繼補。張衡亦在洪武三十年謫發南京留守右衛後不久即告代還鄉，由義男張驚福繼補軍役。父子倆面對天外飛來的又一名軍役，心中驚懼可想而知。

通過張衡的描述，我們知道張億當時被勾解縣，唯恐戶下因此再添一名軍役，甚至不惜供說張左是自己「另居各籍」的叔父。他以手中握有洪武四年戶部給發的二十一號戶帖為證，證明自己與持有二十號戶帖的叔叔張左不同戶。又因為張左與三子分立戶籍的洪武十四年，正是初編黃冊之年，可以說張左與張億自有黃冊始，即分屬兩戶，因此查證歷年黃冊，也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綻。張億最後成功的免除親人繼補張左名下軍役之禍患，而面對此一認父作叔的過程，身為張左長孫的張衡竟也全不避諱，遺囑中如實記下父親的供詞。

張億、張衡因侵佔沒官房屋罪充軍，同樣在張左充軍前夕獲得部分房地產的張儀、張脩兩兄弟卻似乎絲毫未受波及。張脩卒年不詳，但應早於母薛氏之死，死後絕嗣，³² 所繼家產或為同居關四十四都之次兄張儀併入戶下。永樂六年張左絕戶坐勾，張儀卻不願對牽扯入的兄長姪兒伸出援手，這使得兄弟叔姪間產生了

²⁹ 參見《南張世譜》第一冊，〈順寧公遺囑〉。

³⁰ 參見《南張世譜》第一冊，〈觀復公遺囑〉；第三冊，〈張君輔元配薛孺人墓誌銘〉。

³¹ 明代大造黃冊年分，參見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97-98。

³² 《南張世譜》無世系表或世傳，各輩子孫生卒年或娶妻生子狀況甚難知曉。據〈張君輔元配薛孺人墓誌銘〉，薛氏死於永樂元年，所生三子二女，長子億，有五子二女；次子儀，生二子四女；三子「脩，娶任氏；（長女）貴娘，嫁朱行簡；（次女）足娘，嫁周彥達，皆先卒」，可知張脩早卒無嗣。

不少嫌隙。〈觀復公遺囑〉留有一段記載頗耐人尋味：

叔儀之等詭立民籍在鄉，久避軍役，賴我父與弟術遞年擺佈，回申執結。

緣無補報，將四十四都後莊圩恃字四十八號地二分三釐送為紙筆之費。永

樂十年，立契賣與我父。故，收在術戶內，每歲租米二斗五升。

本來張左與三子分戶在充軍之前，其時眾人所立應皆為民戶。及洪武十八年、二十五年張左與張億分別充軍，二戶由之成為軍籍；張儀卻因僥倖未被查出，得以維持民籍。³³ 在張衡以為，父、叔三人分得祖產的情況相同，理應同樣落入軍籍；至少也該念在兄弟之情，支援張左留下的軍役官司；張儀卻不聞不問，避之猶恐不及。因此說他「久避軍役」，一逞心中之憤。但若要說張儀「詭立民籍」，實在沒有道理。永樂六年以後，張億與次子張術連年都要為應付張左軍役的坐名清勾到處打點，一再的回覆申結；張衡為此也貢獻出名下土地二分三釐，供父親、弟弟官司紙筆之費。這筆土地在父親死後，也隨之過戶到弟弟張術戶下。

張左名下的軍役一直要到宣德三年（1428）才終於被清理出來。《南張世譜·充軍文冊》有云：

一名張左，洪武十八年為李榮三告吏役事，發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充軍，病故。宣德三年清理軍伍，勾張左本軍。男張儀、張脩俱各病故，當將張左戶下漏籍義男張阿官解發蘇州衛。

似乎在宣德三年清軍時，還曾經一度勘問至民籍的張儀、張脩。當時張億、張衡或已身亡，³⁴ 牽扯出張儀、張脩的或為張術。但其時儀、脩二人俱已亡故，最後還是將逃逸的張阿官緝捕歸案。

張阿官為張演住在營所生子，於演住死後逃至江陰縣乞食為生。宣德三年清出時，「年四十四歲，審無妻小」，隨即「差長解蔣英解附近蘇州衛收操」。翌年，復「為守衛事，選調羽林左衛千戶所百戶江漢下當軍」。

³³ 據《南張世譜》第一冊，〈杏花臺祖塋考〉，杏花臺祖塋有荒山三畝五分，係永樂元年正月張衡購自一都住人龔福三者，於「當年攢造黃冊，推收過戶」；另外，「叔儀之公亦有三畝五分，收在民籍。每歲樵柴，各分其半」。可知在永樂年間軍役紛爭擾攘之際，張儀確仍維持民籍。

³⁴ 二人卒年不詳。但張衡遺囑作於永樂二十年（1422），張億遺囑撰寫時間雖不詳，但因文中有「長男衡……發留守右衛充軍，已及二十五年」，由張衡發充軍的洪武三十年（1397）起算，大約也作成於永樂二十年，但稍早於張衡立遺囑的四月十五日。參見《南張世譜·觀復公遺囑》；同書〈順寧公遺囑〉。

張阿官解送羽林左衛後娶妻生子，其後又逃，經衛所勾補，於正統二年「挨得張阿官不曾逃回（常熟），拘得本軍同籍親姪張紳，并妻曹氏，差解人蘇回住解衛補役」，「在中左所百戶翼春、總小旗缺下當軍」。張紳雖為張阿官親姪，與張左一家卻並無淵源，只因為是張左義孫的姪子而被勾補役，明代軍役牽連之廣由此可見。

〈充軍文冊〉有關張左軍役的繼補紀錄至張紳而止，其後續云：

今為建言事，別行清理，收勘張衡立籍四十四都，張衡立籍四十二都，張衡立籍，³⁵ 遵依軍政條例，緣祖孫父子軍役，俱應歸併聽繼。

所謂「歸併」，據霍冀撰，《軍政條例類考》卷五，正德七年（1512），巡按直隸御史何沾，〈題為申明舊例以裨軍政事〉：

一、清戶籍以革宿弊。臣切見按屬軍民人戶中間，軍多逃絕，民多見存。豈天薄於軍而厚於民哉？蓋緣所欲在此而所畏在彼耳。查得洪武初年以來，有一父所生二三子或四五子，父子各立一籍，或過贅與人作義男、女婿，後父為事充軍或犯法典刑，全家發衛者，止儘隨戶人丁補當。後因逃故等項，就作丁盡戶絕開豁。既父為軍，眾子應該承繼，卻稱分戶在前，推脫之弊不可勝數。況父子之親，比與兄弟者不同。今照軍政條例內開：祖孫父子分居後為事充軍，食糧年遠者，不准開豁。如蒙乞敕該部通行各該清軍官員，吊取洪武十四年至今軍黃等冊，逐一查勘。但係子孫因父祖充發者，不分同居、異籍、過繼等項，悉皆斷令歸併承繼，已絕者就行解補。如此則軍伍充實而少革弊矣。

可知是在明代中期軍役缺乏的情況下，對軍役繼承資格採取從嚴解釋形成的產物。何沾引用的軍政條例，原文如下：

有族屬疏遠及異姓人舊為同籍，後乃分戶，如以罪充軍在分戶之前，宜將舊同戶之丁解補；在分戶之後，止許於有罪人戶下勾取。其有聞親屬有罪充軍，懼及於己，妄為文憑，作分戶在充軍之前；及祖孫父子分居，並充軍食糧年久者，不許。

³⁵ 「張衡立籍」四字下疑有缺文。《南張世譜》於道光年間修纂時，明初資料大多流散，有不少乃是取自於「贛州支殘譜」，見〈南張撫言緣起〉。如〈順寧公遺囑〉即謂：「謹案：譜中未刊目錄，原有順寧公遺訓，此從贛州支本錄出」。〈充軍文冊〉亦曰：「贛州支本之錄此也，乃其導後人以善也」。贛州支本既殘，字有缺漏亦不足為奇。

實錄繫之於宣德四年（1429）八月癸未，³⁶ 但從永樂二十年張衡在所立遺囑中，敘述自己曾引用「分戶在前，充軍在後」例，成功阻斷二弟道衍意圖以三弟張衢替補軍役之事（詳下）來看，推測該條例成形的時間，至少可上推至永樂年間。《南張世譜·充軍文冊》中有關張左名下軍役應繼人選的討論，對張左父子分居、分戶時間著墨特多，亦顯示當時清軍官員確實以充軍前是否已「各另立戶籍」，作為判斷的重要依據。何沾自己也說，對於那些早在洪武初年已經分立戶籍，分戶後父親才為事充軍，並遭判處「全家發衛」者，正德以前的一般作法，是「止儘隨戶人丁補當」的。如果何沾「既父為軍，眾子應該承繼」的解釋才是最符合軍政條例精神的解釋，何以前絕大部分的清軍官員不能掌握其間精義，遂至為軍戶大開方便之門？這與軍政條例內容太過簡略，文字容易引發誤解有關。

首先，原條文只說「祖孫父子分居」，而未及是否分戶。以張左父子為例，洪武三年張左與三子尚是「同居共業」，翌年即父子兄弟分居兩地。洪武十四年四人各另立戶籍，這時即使張億尚與父同居，二人卻分屬二戶。其次，原條文在「祖孫父子分居」的選項之前，提到「其有聞親屬有罪充軍，懼及於己，妄為文憑，作分戶在充軍之前」，似有強調因懼怕被波及而在充軍後偽造文書假作分戶在前者才受規範之意。這些都使得清軍官員在引用法條時，多出許多模糊地帶。何沾強調「但係子孫因父祖充發者，不分同居、異籍、過繼等項，悉皆斷令歸併承繼，已絕者就行解補」，使得無論是先已分戶者或出繼他戶者，都必須同受規範，大幅提昇了法條的針對性與明確性。

何沾的從嚴解釋得到兵部的認同，成為「軍政條例」公佈施行。譚綸等輯，《軍政條例》卷二，正德七年（1512），〈戶丁類·出贅過房族屬分戶〉：

各處清軍御史嚴督司府州縣清軍官，揭查清勾文冊，不分遠年近日，凡有祖父為事充軍，或典刑，全家發衛者，其子孫於未充軍之前，或出贅與人為婿，或過繼與人為男，俱該收併聽繼。如遇缺伍，挨次解補。其族屬疏遠，充軍在分戶之後者，查無妄捏奸弊是實，仍查舊例開豁。

新訂清軍條例強調只有族屬疏遠且在充軍之前即已分戶者始得豁免軍役；對於有祖孫父子之親者則包括充軍前已「出贅與人為婿」或「過繼與人為男」者，「俱該收併聽繼」。條例中未及分居子孫，當是因為宣德四年訂定的原條例俱在，新條例僅就其不周全處加以補充。而新條例既對出贅、過繼者都不放過，分居子孫

³⁶ 參見《明宣宗實錄》57：4a。

更不待言。此例一出，張衡、張衡（張儀次子）、³⁷ 張衡（出贅外姓）的子孫俱被收勘，「遵依軍政條例」，歸併到張左名下聽繼。張億、張衡終其一生致力於與張左軍役劃清界限，結果還是失敗了。而張儀子孫儘管過去長期隸屬於民籍，當此「清理收勘」之際，終究不能倖免。不難理解，一百年前張億認父為叔能夠得計，全是靠著張億父子的多方打點。而一百年後，張衡、張衡、張衡子孫俱被清出，正可見至少到明中期為止，清理軍政系統的運作仍相當有效，只要主事者有心，對明初以來軍籍子孫的掌握是可以達到鉅細靡遺的地步的。

張億名下的軍役，後續是在「正統二年勾孫張紱，同男張德輝、義弟王永福、義男張阿雙，差解人俞阿狗解衛。在中左所千戶高塢、總旗陸勝、小旗邵文下當軍」。天順四年（1460），張紱與男張德輝仍在營服役，衛所方面又從常熟將紱姪張天祥勾解到衛。後張天祥「在衛告患殘疾，帖給原籍聽繼」。

〈充軍文冊〉收載的軍役，尚有一名落在張億第三子張道衍身上。對於這一名軍役，〈觀復公遺囑〉著墨特多：

弟道衍，洪武二十年出家本縣致和觀為道士。二十二年黃冊：本戶開除，致和觀收籍。二十五年赴京請給度牒，分撥廣洋衛，帶管習字幼軍。改發金齒衛充軍見在。有例：僧道犯事充軍者，止及本身。又例：分戶在前，充軍在後。如日後勾補，必當分理。

張道衍既於洪武二十二年由張億戶下開除，當時雖然只是改入致和觀戶下，並未另立一戶；但畢竟已非張億戶下人丁，名下軍役得比照「分戶在前，充軍在後」例，由張道衍子孫承當。³⁸ 張衡將之列入自己遺囑中，乃是為了提醒自己派下子孫將來不致被混勾補役。這一點，同樣見於張億遺囑。事實上，〈順寧公遺囑〉對分別源自張億、張衡與張道衍的三名軍役日後各應由何人繼承都有清楚的交代：

長男衡……發留守右衛充軍，已及二十五年。艱難勞費，窮困百端。彼時諸弟尚幼，難以補助。今無可奈何，聽其自行承當，子孫應繼，別無他議。
三男道衍……蒙充軍後，陳告給聚，即在金齒娶有妻室。前以得病，來取弟衡名字。我告理回申去訖，又脩書央鈕姓寄去。今經十七年不曾來勾。
衡云：恐日後又來勾擾，鹽井無人補役。本衛二次申勘合來勾故軍戶丁。

³⁷ 張衡為張儀次子，見《南張世譜》第三冊，〈張君輔元配薛孺人墓誌銘〉。

³⁸ 〈觀復公遺囑〉雖指出，「有例：僧道犯事充軍者，止及本身」，但一如〈順寧公遺囑〉所陳，張道衍赴金齒後娶有妻室，很可能生有子嗣，因此再引「分戶在前，充軍在後」例，以為屏障。

術、衢、衡三人答應區處，和議覓人當軍。衢、衡俱令贅出，術宜推至情優恕之。

我今老病衰朽，朝不謀夕，恐我身後，兄弟之間為此軍事，議論不和，致傷骨肉。故寫此遺命，列名畫字，不許臨時推託。各收一紙照行。

張億共有五子。長衡、次術、三道衍、四衢、五衡。張衡於充軍後不久即告代還鄉，永樂二年經由常熟縣保舉，起送南京文華殿寫誥。³⁹ 永樂九年，乞老歸田，此後繼承祖業，訓蒙賣藥。由於幾個弟弟年紀尚幼，老父親無力兼顧，只能要求張衡顧好自己名下的軍役，規定日後仍由張衡子孫承當。

至於張道衍，因在充軍之前已經由本戶開除，因此在張道衍因病想勾取大弟張衢代役時，被張億以「分戶在前，充軍在後」為由回絕了。張億同時託請友人帶信給張道衍，動之以情，說之以理。這一招似乎也確實奏效，此後十七年不曾來勾。

剩下的是屬於自己名下的鹽井衛軍役。由於術、衢、衡三子俱無意當軍，因此「和議覓人當軍」。大約張經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出線的。張億又恐三子日後發生爭議，於是令張衢與張衡出贅，只留二子張術在戶，子孫應承鹽井衛軍役。

綜上可知，張億、張衡因飽受軍役之苦，遺囑中對本身軍役的來龍去脈交代特別清楚，對祖孫兄弟間夾纏不清的軍役繼承關係也特別在意。除此之外，張衡在遺囑中還詳細敘述了自身財產的出入狀況，由之亦可見軍役負擔帶給他的沈重壓力。除上舉為協助父親應付張左軍役訴訟而捐出的土地外，按照他開列的先後順序，第一筆為坐落中街巷的民地一段，於洪武二十七年「用金銀首飾紵絲綿紬等物，准價銀一十四兩五錢成交」。由於張衡生前「所住房屋基地俱是沒官之數，惟此地可以栽種蔬菜、起造房屋」，因此規定「非門戶大事、軍役重情，斷不許變賣與人」。子孫違者「以不孝論，許族中尊長整治」。

第二筆土地位在四十四都，購置時間較早，共計官民田七十餘畝。這部分「因軍事騷擾，連年變賣」，至永樂二十年立此遺囑時，已然「使費俱盡」。

第三筆係於永樂十九年購自鄰人邱方的一段民地，價鈔七十貫，交與長子張純、三子張繼收執。

第四筆為洪武三十一年向同隅住人蘇文通轉承佃的被抄沒地一段，其「地二

³⁹ 《南張世譜》第二冊，〈觀復公應詔赴京師序〉謂：「永樂二年冬十月，詔徵天下善楷書之士，寫給奉天征討誥命。上臺以常邑乃子游文學之邦，昭明較書之地，必多俊彥，命縣舉其人。縣遂舉以平張茂才應」。張衡字以平，見同書第二冊，〈薦辟仕宦〉。

百七十步，季納賃錢二百七十文」。此一部份因「所有告佃文憑遺失不存，只有合同契照」。

張衡遺囑對於當年父親張億繼承自祖父張左的遺產去向，也有簡單的說明。大體說來，分給張衡的祖產「皆為父子前後充軍所費」；僅存的租田一十餘畝「見存與純等，以備日後不虞之用」。張衡所謂的「充軍所費」，應該包括充軍前的官司打點，以及充軍後的軍裝盤費。又因涉及所謂的「沒官房屋事」，猜想他父子二人取得自張左第二次分撥的屋地，很有可能在洪武二十五年及三十年間，陸續被抄沒了。〈觀復公遺囑〉謂「祖遺房屋基地，只今是弟衡居住」，這部分財產或為第一次標撥所得，不在充公之列。張衡自己則住在「所佃官房官地」上，僅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由於父子二人經濟都不夠寬裕，遺囑中並未指定幫貼軍役用的「軍產」，只就僅有的可以自由運用的田產，嚴格規定子孫不得任意變賣，否則以不孝論處。

張衡遺囑中最為難得的，是對所謂家人義子的陳述。張衡自己說過，他因「軟弱不堪征操」，到衛不久即以張驚福代役。〈充軍文冊〉則謂張衡「充留守衛石城門千戶所總旗王士忠下當軍，告將隨營張黑子頂名補役」。無論是張驚福或張黑子，都不過是義男之屬；二人且因在營繼役之故，遺囑中並未多加著墨。〈觀復公遺囑〉特別提到張阿安與張纓兩人，兩人的故事都很精彩。

張阿安是永樂七年張衡在南京大中橋居住時遇見的乞丐。本名王安，金壇縣人。祖父王良一，於洪武年間充邵武衛軍。病故後勾父親王毛頭補役。留在原籍的王安無所倚靠，「漂流四散，求食度日」，於十五歲那年被張衡收留，改名張阿安。永樂九年，張衡告老歸鄉，將阿安帶領回家，撫養成人。永樂十八年，「用折茶禮糙粳米五石，娶到本縣四十四都住人干阿勝女干氏為妻，一向在家居住」。翌年，因戶部有令：「原籍有司覆審逃戶。如戶有稅糧，無人辦納，及無人聽繼軍役者，發回」復業，⁴⁰ 張衡有意首告改正，將阿安發回原籍，卻被阿安於「永樂二十年二月初五日，拐帶鈔五十貫，逃去妻父家」。干阿勝乍聞女婿出身軍籍逃戶，既恐張家派人來尋，又恐自家受到牽連，情急之下，先將夫妻倆轉送下塘外祖周阿金家，後又央請親戚俞忠，將二人送回張家，再三哀求張衡繼續收容。張衡一度心軟，停止出首，然幾經思考，「又恐日後別作非為，有所連累」，最後仍決定在本圖老人處出首。沒想到干阿勝反而心生惡念，威脅張家要

⁴⁰ 參見萬曆《大明會典》（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二二八卷，據明萬曆間司禮監刊本影印，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19：352-1，〈戶部·戶口一·逃戶〉。

于志嘉

首告張億軍事。⁴¹ 張衡對此萬分無奈，遺囑中言到：「我今衰朽，朝不保暮。倘有一日不幸，就令自住，以絕禍根。我比先不合容留此等人，一時草率，追悔無窮。今後子孫切莫為之」。對於阿安日後所生兒女，也交代子孫：「再不許留用」。

至於張纓，身分更是敏感。張纓原名奚英，松江府華亭縣人。永樂六年，「為小和尚事發，問充茂山衛軍」。奚英來到張家，乃是在永樂十一年。〈觀復公遺囑〉謂：

永樂十一年，表弟時宗濂軍中帶回伊男時璣，送與我義男。

可知奚英充軍後逃亡，先被張衡表弟時宗濂收為義男，改名時璣；後來又因時宗濂的引介，成為張衡名下義男。當時張纓已二十歲，張衡教導他「習讀醫書，專令脩合藥餌」，成為事業上的幫手。張衡後來也為他娶妻，「一向同聚」，彼此相處融洽。相較於張阿安的尾大不掉，張纓其實是聽話而且有相當利用價值的。只是，「細思奚英係別縣脫漏軍人」，一朝事發，難免累及無辜。對此，張衡也只能囑咐長子張純：「宜早圖之，遣還時璣方好」。

張衡有三子，張純、張紉、張繼。由於家業不多，出贅的次子全未分得任何財產。儘管如此，張衡家中仍收留了為數不少的義男，目的是幫助生計、分擔差使。張衡的次女自幼殘疾，張衡為她招贅了一名女婿。但由遺囑中所謂「贅婿金銘在家，名為我婿，卻不當我差使」，亦可見招來的這名女婿原本也是希望他能幫忙承差的。金銘、張驚福、張黑子的身家狀況不明；但遺囑中提及的阿安、張纓，兩人剛巧都是軍籍。尤其是張纓，以逃軍身分先後為時宗濂、張衡收留，時、張二人亦皆為軍籍。

時氏入為軍籍事，略見吳訥《大全集·節義堂記》：

節義堂者，海虞時琳文英扁其奉母之所也。時，海虞著姓。文英之父曰宗淵，夙秉聰慧，總角矢口成詩，名動鄉邑。贅同里蔡氏，甫踰朞，為房兄連逮，謫戍滇南。

時宗淵之房兄或即為時宗濂，其犯事不詳。時宗淵遭牽連時，已出贅同里蔡氏，但仍不免於謫戍滇南。臨行前，將老母託與蔡氏，獨自一人前往戍所。後在滇娶側室，生三子，並於永樂初命長子時琳歸侍蔡氏。蔡氏撫愛時琳如己出，使受教於張衡；而時琳亦「篤志問學，孝其母亦弗啻若所生者」。張衡因時琳嫡母能克守婦道，而宗淵又能「念蔡之獨居守志」，命琳「不遠萬里歸養，可謂交盡節義

⁴¹ 原文謂：「豈期干阿勝反生惡意，欲告我父軍事」。其文意不明，猜想與張億認父作叔，逃避張左名下軍役事有關。

者」，遂以「節義堂」命名其所居。

張衡原擬為節義堂作記，「未及為記而卒」。時琳乃委請與父親自幼即「遊從甚密」，後又有「姻婭之好」的吳訥代為之記。吳訥亦常熟人，其父遵，洪武中「任沅陵簿，坐事繫京師。訥上書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歿，訥感奮力學。永樂中，以醫薦至京」，後官至左副都御史，卒諡文恪。⁴² 吳訥幼從張左學，為門人中最著者。未出仕時，與張衡同在鄉里懸壺濟世，兩人有詩唱和。⁴³ 而吳訥父親在沅陵主簿任內因事被逮，卒於獄中，其所犯事或因此不了了之，否則吳訥或也不免於充軍之命運。

張衡的友人中，也不乏軍籍出身者。《南張世譜》錄有龔詡《野古集》中收載的〈張觀復先生哀輓二首〉，其一為：

昔年幸獲叨文會，今日哪知死別離；我輩正懷瞻北斗，先生何忽跨南箕。

濟人誰施囊中藥，傳世空遺篋裡詩；道路行人盡流涕，況予深荷叔牙知。

足可見二人交情之深厚。

龔詡，崑山人。父龔督，洪武十一年中文學科，選授岳州儒學正。母王氏，洪武十五年生龔詡於岳州寓所。十六年陞岳州為府，龔督改調岳守，未久，以敢言遷兵科給事中，尋轉兵科都給事中。洪武十七年三月，龔督以言事獲罪，《野古集·年譜》謂：

春三月，叔言（龔督）以言事獲罪，謫戍五開衛，胥靡以行。母王氏與子女先逮至湖廣，會赦，得還鄉里。與叔言會於塗，相號泣以別。獨攜幼子女三人東歸。道喪其二，所存惟先生一人。時國禁方嚴，戍者不得與親屬偕。叔言至五開不久而卒，遂墓其所。

似乎龔督之罪原本牽連妻子四人俱遭逮捕，但在遣送至湖廣時遇赦，四人遂得以返回崑山故里。而龔督則因有重械繫身，一路緩行，竟與妻子在道中相遇。是年王氏三十五歲，三名子女俱皆年幼，最小的龔詡實齡尚不滿一歲半。王氏孤身一人，無力保全三子，最後只得龔詡一人存活。

龔督到衛後不久即死。「五開以叔言物故，勾補伍者無虛日」。時龔詡隨母親王氏歸依外家，祖父龔德新與從兄龔瑀「閔其寡弱，陰賄用事，得緩其行」。

⁴² 參見《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臺北：鼎文書局，1982），158：4317-4318，〈列傳四十六·吳訥〉。所著《大全集》筆者未見，轉引自《南張世譜》第一冊，〈吳文恪公節義堂記〉。

⁴³ 參見《南張世譜》第二冊，〈耆碩〉、〈薦辟仕宦〉。

洪武二十八年，龔詡十四歲，遂「補戍遼陽，充五開衛卒，屬築城」。⁴⁴

龔詡在遼陽負責運磚的工作。他年紀雖小，做事卻極有條理。「見主者憤於所事，乃疏其方畧，挾書從事。主者異而禮之」。洪武三十一年，龔詡年十七歲，時北方有事兵亂，戍卒逃亡者多，龔詡亦隨之逃逸。十月，詣闕請補近衛，以衛王宮。乃撥歷城侯盛庸部下調用。

建文三年，龔詡從征淮陰，戰敗逃歸，仍守衛王宮。翌年，守金川門。六月十三日，成祖靖難兵至金川門，谷王穗以門降。龔詡逃至郊外，見宮中火起，投戈大慟歸鄉里。從此改換姓名為王氏，竄伏於江陰、海虞之間。

在鄉間隱姓埋名的龔詡，最遲到了永樂四年，開始訓蒙授徒的生涯。其間四處飄泊，不斷更換居所；⁴⁵ 母親王氏則始終獨居於崑山，母子被迫分隔兩地。洪熙元年（1425），龔詡年四十四歲。是年仁宗即位，「詔諭羣臣解建文被罪臣禁，寬恤軍政」。龔詡的罪名終得平反。但他原本隸屬於五開衛的軍籍，自靖難以來，屢遭清勾，「縣受文牒至四百七十」。宣德七年，有司復奉詔例清理軍伍，是年以龔詡老弱無嗣，改編於鄰近的鎮海衛戎籍。

上舉諸例，自張左一家四役始，加上張衡收留的義男張纓，張衡的姻表兄弟時宗濂、時宗淵，以至於學友龔詡之父龔督，無一不是因罪謫充軍役，明初嚴刑峻法由之可見。⁴⁶ 張左祖孫三代雖藉收養義男，代充軍役，得以免去自身之勞；

⁴⁴ 按：龔詡撰，《野古集》（三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3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譜〉謂：「會勾補伍者益急，乃去補戍遼陽，充五開衛卒」。但五開衛在貴州黎平府，屬湖廣都司，並不在遼陽。據《明史·地理七·貴州·黎平府》46：1207，「洪武十八年正月置五開衛，屬湖廣都司，後廢。三十五年十一月復置」。五開衛暫廢時間不詳，但由《明太祖實錄》可知，在五開衛設置的同月七月，五開洞蠻即聚眾為亂（參見是書 174：3b-4a，洪武十八年七月庚辰；214：1b, 2b，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午、辛亥；215：1b-2a，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乙未；216：2a-b，洪武二十五年二月戊午；224：3b，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己巳）。洪武三十年六月則有靖州洞蠻寇五開（參見是書 253：5a，洪武三十年六月庚寅）。若〈年譜〉之說無誤，龔詡以五開衛卒身分補戍遼陽的洪武二十八年，正是五開亂事不斷的時候，其時無論五開衛是否存在，要將補役軍丁解入戰區定有其困難。龔詡或因此轉解遼東。

⁴⁵ 例如他在永樂四年，「授徒於言城周敬修氏」；六年，「寓居常熟馬字昌氏」；十二年，「避居琴水上」；十八年，「客居湄水之上」；二十二年，復「客居琴川」等等，俱可見其飄泊之苦。他自己亦曾在永樂十五年賦詩寄懷：「竄伏江鄉二十年，艱難生計總無便；童汪非怯當年事，為有慈親在故園」。以上俱見《野古集·年譜》。

⁴⁶ 參見黃彰健，〈明洪武永樂朝的榜文峻令〉，《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237-286；楊一凡，〈四編《大誥》所反映的明初社會〉，《明大誥研究》

但也因受軍役訴訟之累，辛苦經營所得田產幾乎全數折損。張衡為求營生，不得不收養義男協助生計，又因自身遭遇，對同樣出身謫充軍的逃人特別同情，不想卻因永樂十九年戶部覆審逃戶，面臨窩藏逃民之罪名，終至臨死棲遑，抑鬱以終。遺囑中對過去自己收留軍籍逃人為義男，聲聲悔恨。也難怪後人修譜，思及「爾時國法慘如秋荼」，要「觸目警心」了。⁴⁷

（三）湖南善化司門前周氏

司門前周氏始祖周智，原籍南直隸和州含山縣第八都桐城鄉運造市人。元末從戎於胡招討，為先鋒。洪武初，除江西永新守禦所副千戶，卒葬永新縣箬光寺西山地。生子全，洪武六年襲父職，卒葬永新縣箬光寺西山地。全生二子，長子鼎，洪武二十九年除廣西潯州衛後所世襲副千戶，卒葬潯州衛後所山地。鼎生一子威，洪武三十一年除授湖廣長沙衛前所世襲副千戶，與叔（全次子）暹同遷長沙，駐筭於古之義王司門前，「即今善化縣屬地之黎家坡及阿彌街」。此後「由五世迄十三四世，歷相承襲祖職，聚處其地」，遂「有司門前周家之稱謂」。⁴⁸

周威卒於宣德二年，葬長沙府善化縣二十都長樂鄉旌表里岳麓山地。⁴⁹ 其後威長子誠、誠長子雄、雄長子瑞俱世襲長沙衛副千戶。弘治十四年，周瑞被調征武靖、城步，十二月攻打桃林金洞、大竹山寨，以斬獲軍功陞長沙衛世襲指揮僉事。⁵⁰

周瑞卒於正德十四年（1519）。生前於正德十一年及十三年兩次立下分關，將財產均分給四子嵩、崇、巖、山。《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關約》卷十二備載兩次分關的內容，可知第一次分關，四子各分得田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屋宇舖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頁 144-160。

⁴⁷ 參見《南張世譜·觀復公遺囑》。

⁴⁸ 《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周義和等主修，十二卷，1924 年汝南堂木活字本，上海圖書館藏），1：2a-b，〈續修凡例〉。周智以下世襲記錄見同書 4：4a-19b，〈吉甫公開派至十派總世系錄〉。

⁴⁹ 據光緒《善化縣志》（吳兆熙等續修，張先掄等纂，三十四卷，首一卷，清光緒三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線裝書），3：18a-b，〈疆域·鄉里都甲〉，善化舊轄永康、忠臣、長樂、興化四鄉，明初編一十六里，後改為十里。清初均為十里。

⁵⁰ 參見《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吉甫公開派至十派總世系錄》4：9a-b。征武靖苗蠻事見《明孝宗實錄》206：1a，弘治十六年十二月丁酉：「錄湖廣武靖等處征苗功，都指揮王閏等十三人俱陞署一級」。

于志嘉

店、什物桌椅盤盒各若干。第二次分關，則是將正德十一年以後又陸續新添的金銀器皿、衣服及鋪房田地等，除去若干留作自身及妻妾將來衣棺殯葬之用外，再行分與四子。第二次分關書中，最值得注目的是對家人的分配。在長子周嵩名下有如下記事：

家人五大房：麻山周泰輔等、黃土橋周萬鏡等、白石港周清等、易俗河周鳳等、益陽周時泰等，俱祖傳幫官人之供應做官，各房弟姪不許分用。如有後代子孫將五大房人分用者，前輩亦要均分。外有朱思義、朱思仁全房人口應用。見分家人三名：周釗、周揚夫婦二口。

次子周崇名下有：

見分家人五房：周通一房、周辛一房、周位、周敬、琴童。……外家人一大房：周全禎全房男婦等供應。

三子周巖名下有：

見分家人五房：周信一房、周旻一房、周教一房、周萍一房、畫童。外家人一大房：周興祖全房男婦人口等供應。

四子周山名下有：

見分家人五房：周貴一房、周佑一房、周佐一房、周仁、廣兒等。外家人一大房：周允仁全房男婦人口等供應。

四子之外，周瑞為四個妾徐、梅、瞿、吳氏保留了使喚家人：

家人三房：周湘、周汴、漢有、子湘等俱是。

至於未列名分關書中的其他無子嗣家人，俱歸么兒周山使喚。⁵¹ 可能因為周山妻子同樣出身武官家庭，需要比較大的排場，因此較兩位兄長多分得了幾位家人。周瑞另外還因為「父母墳上缺人看守」，特別「撥二房周界、周傑全房人口，永為定規看守」。

分關書中，崇、巖、山三子除各獲得家人五房外，另各分得家人一大房。長子周嵩則因為世襲了指揮僉事職，承分特別不同。分關書中說的明白，五大房家人是祖傳用來幫貼武官的，「各房弟姪不許分用」；周嵩因此得以獨享五大房之使喚權。除此之外，他還另外分得朱思義、朱思仁全房人口，以及周釗、周揚夫婦等三名應用。

⁵¹ 此段文字，合上下文應為：「徐氏等名下家人三房：周湘、周汴、漢有、子湘等俱是。他家人無子，俱屬周山喚叫。」文意不明，斷句甚難。若筆者斷句不錯，或可解釋為除分關書中列名的眾位家人之外，尚有未列名的其他無子家人數位，俱歸周山使喚。

朱思義、朱思仁等朱姓家人，乃二派祖周全妻朱氏的陪嫁家人後裔。至於同屬周姓的家人，分關書中分別以「家人五大房」、「家人五房」、「外家人一大房」等等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就其實質內容來看，「家人五房」應指五名年輕的家人及其妻小，其中如周位、周敬、琴童、畫童、周仁、廣兒等，可能在周瑞分家時還是單身，但已預告將來一旦結婚，妻小將同被驅使。而所謂的「外家人一大房」，可能是指崇、巖、山三子於五名年輕家人外，各另分得一名較年長的家人，其名下已有子媳數人甚至孫輩，全房人口俱供使喚。由於「五大房」家人僅供周嵩應用，周崇等人分得的家人似應在「五大房」之外。究竟司門前周氏一族有多少家人，根據同書卷四，〈各鄉人丁〉，可知其大概：

人丁雖分住遠，每歲例有茶價、魚鮮、幫操、油燈銀兩等項。出外有稽，生事有戒，務令咸若于訓，以體先人慈使之說。

益陽縣地名軍山、銀杏、達茅衝、苦竹山、老屋等處，周鄂輝、周時太子孫：周正善、周喬、周池、周會、周紫、周倫、國人、國忠等，逐年認納茶錢若干。

湘潭縣七十七都地名易俗河、余家港，周鳳子孫：周邦仁、周坤、周坎、周興定、周廷忠、周學義、廷秋、廷江，逐年幫操：周元玘、周朝科。

甯鄉縣三十九都地名黃土橋，周萬鏡子孫：周太梅、周廷河、周廷芳、周以德、以仁，逐年幫操：周廷詔、周萬景。

甯鄉縣地名麻山、子山坪、謝家衝、荷葉塘、後湖塘、立基塘、神衝等處，周太輔子孫：周居邦、周世道、周世乾、戶長周明顯、周道顯、周德顯、周登榮、周世恆、周得義、周得化、周得皆、孝保等，逐年幫操：周四保、周有恆。

湘潭縣地名白石港：周紀、周良意、良憲、良恕、良贊等子孫，逐年幫操：周清。

湘潭九十七都地名木瓜衝、打石抗（坑）、鹽堡山等處，周嘉瑾、嘉治、世權、世楣、世相、世亨、嘉奇、世麟、世元、正朋、正先、仲二、仲信子孫，幫操：周伏順、周瑚、周漢。

硤市：周時盛、時連、時建、時進等，網魚為業，謀生亦苦。逐年應送四大房三節鮮魚，此其常套。外認四大房燈油銀，每房八錢。前輩未嘗取盈，今以拜往金字山祖塋，令硤市備大船一隻答應。其他慶弔等項免派，止令供役。蓋仰承我先人之意而善視之。間有貿易往來，必先預稟知四大房

尊長，告以出入之期，不得擅自私行。目今地方多故，不得不為爾嚴約。

澗山河邊：朱明正子孫：朱正賢、彝，係祖妣朱氏所遺。雖未更姓，實為周人。今以人丁寡少，姑兒派應襲。赴京承襲，各鄉例有幫官路費，但各鄉皆祖宗所遺，而應襲享祖爵獨厚，量必不向此輩需路費也。今以各鄉茶錢、幫官路費等項，均之為四大房子孫寒窗燈油之需，以普祖宗之惠外，澗山人丁繁衍，例有新米雞鵝、幫官盤費，聽戶官收用，以示宗子之意。

額操：周太、周璞、周進財。⁵²

司門前周氏族譜創修於崇禎十六年（1643），⁵³ 上引〈各鄉人丁〉所記或為崇禎間的情況。⁵⁴ 這些與司門前周氏絕無任何血緣關係的人丁，總計八大支，散居在益陽、湘潭、甯鄉、長沙、善化五縣各地。其中前五支下，可以看到益陽周時太〔泰〕、易俗河周鳳、黃土橋周萬鏡、麻山周太〔泰〕輔，以及白石港周清字樣，可以確定就是周瑞關書中所說的「五大房」。但五大房中的第一支，到了明末已改為逐年認納茶錢；反而是第六支與前四支一同，有子孫幫貼差操，或許該支是由第一支衍生而來的亦未可知。第七支以網魚為業，或本為開辦魚課的軍戶，⁵⁵ 投充武官家人以躲避差徭，對四大房有逐年供送鮮魚、燈油銀之責，並提供祭祖塋時所需的大船，以及慶弔時所需人役。第八支居住在澗山一帶，包括朱姓及其他周姓家人。除朱姓家人歷來均派與「應襲」亦即承襲武職者使喚外，其餘周姓人丁大約即用來供給崇、巖、山三房使喚。

八大支人丁除需對嵩、崇、巖、山四大房提供人力支援以外，按例尚有「幫

⁵² 此段意亦難解，起始處才說澗山河邊朱姓家人「人丁寡少」，後面又說「澗山人丁繁衍」，猜想分關書中所有分派給崇、巖、山三子的周姓家人，都住在澗山一帶；由於人丁興旺，不但分派給三子綽綽有餘，還有三名家人實占「額操」的名額，是按月領取月糧的軍士。

⁵³ 參見《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族眾議約》1：1a。同書〈源流總序〉1：5b。

⁵⁴ 據《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續修凡例》1：6a-b，四修譜中所收「田糧、祭田、守墳田、各鄉人丁數條，雖時代異殊，丁差久免，概照鈔譜逐一詳刊，以先祖輩世襲武職，原屬軍家，前人遺留筆墨，豈其無異？今仍存之，垂流以付後人也」。據此，推測〈各鄉人丁〉書成於崇禎年間。

⁵⁵ 明代湖廣地區有以軍戶開辦魚課者，其例見萬曆《漢陽府志》（秦聚奎修，十二卷，東京舊上野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捲），5：16b-18a，〈食貨〉，王光裕〈附七所魚課說〉：「開國之初，法禁甚嚴，小民畏威，尚未懷德，每有湖業，輒不敢領。故布為功令，凡大小湖池有名可查，有地可稽者，責軍戶開辦，各領為業，取魚辦課」。

官路費」的供項。但在明末除第八支因人丁繁衍，每年例應提供新米雞鵝及幫官盤費，聽襲職武官收用外；其餘各鄉之茶錢及幫官路費等均已改歸「四大房子孫寒窗燈油之需」。此外，第二至第六支下，計有周元玘、周朝科、周廷詔、周萬景、周四保、周有恆、周清、周伏順、周瑚、周漢等十名幫操，或為武官名下之「優免人丁」。

第八支末尾，開有「額操：周太、周環、周進財」，應指按月領取月糧的軍士，顯示明代武官家人中，也有佔缺當軍的。

衛指揮僉事為正四品官。根據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戶部議定的京、外官優免徭役事例，四品外官得免糧八石，人八丁。若「戶內丁糧不及數」，亦只能「免實在之數」，不得因丁多糧少而以丁准糧；或因丁少糧多而以糧准丁。⁵⁶ 司門前周氏明末幫操人丁是否全數出自家人不詳，但就算全數出自家人，上開十名也已超出政府允許的額度。如果司門前周氏並未違法多開，那麼關鍵可能就在武官之外的三名額操軍丁。

按照明朝政府的規定，衛所軍一名，得優免原籍戶下人一丁差役。若在營有餘丁，亦免一丁差使。目的就在令其專一供給軍士盤纏。⁵⁷ 明末司門前周氏指揮僉事名下另有三名額操軍丁，這三名軍丁各可優免在營、原籍各一丁，周氏一門可優免的人丁數自然隨之增加。⁵⁸

⁵⁶ 據黃彰健編著，《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4：467，〈戶律一·戶役·賦役不均·新例補遺〉：「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戶部查議，該刑科給事中胡叔廉題，本部覆題，奉欽依：各該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備行各該大小衙門。凡遇審編徭役，悉照今定優免事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如戶內丁糧不及數者，止免實在之數。又如丁多糧少，不許以丁准糧；丁少糧多，不得以糧准丁。俱以本官自己丁糧，照數優免。但有分門各戶，疏遠房族，不得一概混免，及巧立女戶詭寄等項情弊」。又見《明世宗實錄》300：6a-7a，嘉靖二十四年六月辛丑。

⁵⁷ 參見《皇明制書·軍政條例》12：4a，「存恤軍士，合照依宣德四年二月內欽奉勅諭內事理；每軍一名，優免原籍戶下人一丁差役。若在營有餘丁，亦免一丁差使，令其專一供給軍士盤纏」。

⁵⁸ 明代武官優免事例尚有待進一步研究，上引《明代律例彙編·戶律一·戶役·賦役不均·新例補遺》乃是相當後出的史料，嘉靖以前所見零星的史料顯示武官優免有浮濫乞請的現象，如《明世宗實錄》49：8b，嘉靖四年三月丙戌：「兵部以武職濫乞優免，乃酌議錦衣衛隨朝官指揮免三丁，千戶、鎮撫二丁，百戶、所鎮撫一丁。請著為令。疏中因言，舊制

于志嘉

八大支家人散居各地，比對他們居住的地名，有部分與周瑞田產所在地吻合。

表一：正德十一年周瑞分關書中四子分配土地明細表

	周嵩	周崇	周巖	周山
湘潭縣	易俗河田 5.8 石 尖江衝田 7 石 鹽堡（埠）田 4.5 石	間山羅家塘、 白馬塘田 6.5 石	黃塘尖江衝田 4.5 石 苦竹坳田 6 石	
長沙縣 石牯牛	石觜頭並門首田 2 石 嚴家門首田 3.6 石 灣口田 1 石 六家田 0.4 石 張家衝 3.1 石 茅栗衝抓田 0.1 石	上段田 4.5 石 茅栗衝田 1.6 石 吳家田 4 石 馬頭觜田 0.3 石 段內田 10.6 石	張家衝下段田 4 石 茅栗衝田 8.1 石 吳家田 0.4 石 馬頭觜 4.5 石	曹家塘田 2.1 石 馬頭觜田 3.8 石 段內田 1.5 石
班竹塘	王家田 1.425 石 稂糧田 1.33 石	王家田 1.425 石 稂糧田 1.33 石	王家田 1.425 石 稂糧田 1.33 石	王家田 1.425 石 稂糧田 1.33 石
善化縣				龍山衝田 6.6 石 蓮河上金寺田 13.5 石
	共田 30.255 石	共田 30.255 石	共田 30.255 石	共田 30.255 石

表一所列為正德十一年分關書中四子分配土地明細，其中長子周嵩分配得的田地中，有一處在易俗河，一處在鹽埠，⁵⁹ 正是第二支與第六支部分家人居住

內使免一丁，今定武職例，亦畧與相比云。得旨：內官內使照文職例優免，錦衣衛指揮免七丁，千戶五丁，鎮撫、百戶三丁。」似乎在此之前並未訂定相關規定。而其後嘉靖二十四年六月議定的優免事例，並未提及是否可同時免除原籍、衛所兩方的人丁。理論上，衛所軍人都可免除原籍一丁差使，武官優免似不應侷限於在營一方，但從嘉靖二十四年的條例文字來看，實在看不出武官原籍可享同等優惠。不詳待考。

⁵⁹ 該筆土地在第一次分關書中寫作「易宿河」，第二次分關書中則作「易俗河」。乾隆《湘潭縣志》（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二十五卷，首一卷，續集一卷，據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影印，《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1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5：14b，〈疆域·市鎮〉謂易俗河「以易俗鄉故名。俗呼為一宿河，誤」。另一筆在鹽堡的

地。證諸前文推測第六支係由原五大房中分出者，可知五大房家人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為承襲武官者管理田產。而這些田產也不無可能就是這些家人原本持有的土地，或因投獻，或被侵佔，成為周氏一族的私產。另外，易俗河及鹽埠兩地且都設有市。乾隆《湘潭縣志》卷五，〈疆域·市鎮〉謂：

易俗河市，在縣南二十里，人烟一百七十戶。其市在涓江口內。凡衡山後紅筍、稻米皆聚於此。

湘潭四面環山，湘江貫其中，其次又有河、港、潭、洲、灘、埧、湖、陂塘等，水路交通方便。但也因此居民多依山臨水，星散而居。⁶⁰ 易俗河即僅次於湘江的三大河之一，縣南二十里處有易俗河市，是衡山筍和稻米的集散地。而乾隆《湘潭縣志·疆域·市鎮》卷五收載湘潭市鎮中「稍大者」，除易俗河市外，尚有白石港店、打石坑店、鹽埠店。⁶¹ 白石港、易俗河又各有漁埠可以取魚，漁戶每年需辦納漁課。⁶² 可以發現在湘潭的三大支五大房家人，絕大多數緊鄰市鎮居住，身處市場經濟活絡之處，周姓家人或也參與農作物、漁產的買賣。

由表一尚可得知，周瑞名下的土地並無在益陽縣及甯鄉縣者，但五大房家人中，卻有三大房居住在此二縣，他們平日的生活形態究如何，譜文不載，無從探究。但推想他們的來源，很可能在周瑞父、祖、曾三輩除授長沙衛前所副千戶時即已進入周氏門下。周瑞為司門前周氏第七派，曾祖父第四派周威、祖父第五派周誠與父親第六派周雄各生有二子，推想以五大房家人歸襲職長男使喚的傳統應在周瑞之前即已確立，但隨同家人持入的土地卻歷經數次分家，有些成為小宗支的家產。

周瑞第一次分關時，四子名下分配得的土地非常零碎，尤其是位在長沙縣石牯牛的土地，原本即分成數塊，第一次分關時又再被細分化。例如在茅栗衝的田，嵩、崇、巖三子各取得 0.1 石、1.6 石及 8.1 石；在馬頭背的田，亦由崇、巖、山三子各取得 0.3 石、4.5 石及 3.8 石。王家田被一分為四，四子各分得 1.425 石。在班竹塘的梗糧田也是相同命運，被四分為每分 1.33 石的零碎土地。

土地則前約作「鹽堡」，後約作「鹽埠」，亦當指同一地。參見《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關約》12：1a, 5a。

⁶⁰ 參見乾隆《湘潭縣志·山川》4：6a-b；同書〈疆域〉5：1a, 10b。

⁶¹ 參見乾隆《湘潭縣志·疆域·市鎮》5：10b, 11a, 14b, 15b。據此，「湖南縣邑，其錯處險阻者，多聚族而居，以備守望。衡、長而下，地漸平夸，依山臨水，民居星散，不復百家烟火矣。惟市鎮少自數烟，多至數十百烟不等」。

⁶² 參見乾隆《湘潭縣志·山川·漁埠》4：16b-17b。

于志嘉

這種不合理的劃分方法，應是周瑞為了達成帳面上的公平，努力拼湊出來的結果。但很快的他也注意到零碎化所帶來的困擾。到了正德十三年第二次分關時，周瑞將四子承分的土地稍稍做了調整，表二所列為正德十三年分關書中四子分得之較大宗土地，其他細項以分關書不列無從得知。但由各人分得總數仍維持在每人 30.255 石，可以推知周瑞在這兩年的時間中，應該是非常積極的進行過換地工作的。

表二：正德十三年周瑞分關書中四子分得之較大宗土地表

周嵩	周崇	周巖	周山
易俗河田 5.8 石	羅家塘田 13.2 石	黃塘田 9.5 石	龍山衝田 11.5 石
尖江衝田 7 石	白馬塘田 6.5 石	蓮花墮田 4.8 石	蓮河上金寺等田 13.5 石
鹽埠田 4.5 石		苦竹坳田 6 石	
共田 17.3 石	共田 19.2 (19.7) 石	共田 20.3 石	共田 25 石

比較表一與表二所列數字，可以發現周崇原有間山羅家塘、白馬塘田共 6.5 石，重分配後改為羅家塘田 13.2 石、白馬塘田 6.5 石。周巖原有黃塘尖江衝田 4.5 石、苦竹坳田 6 石，重分配後改為黃塘田 9.5 石、蓮花墮田 4.8 石、苦竹坳田 6 石。周山則原有龍山衝田 6.6 石、蓮河上金寺田 13.5 石，重分配後龍山衝田增至 11.5 石，蓮河上金寺田額不變。

值得注意的是，周山分得的持分中，包括了一分屯田，是即位於善化縣蓮河上金寺等地的田，該納子粒六石。此外，周山妻子張氏的伯父為衛所指揮，他將衛所內故軍張甫遺留下的糧田一分撥給周山耕種，其地在長沙縣第一都土名麻潭、金子灣等處，亦納糧六石。周山還獲得父親周瑞特別為他置買的祖地一塊，供做園地耕種。周瑞並且將分關書中未列名的其他無子嗣家人也都分給周山使喚。顯然，周山因為妻子伯父官居指揮的緣故，倚仗著岳家的財富與權勢，獲得較崇、巖兩位兄長更多的土地與家人。

關書最後，周瑞還為出嫁的女兒留下一些財產：

原父置買軍民劉鉞、何玘屋地三間，父子商議，與女婿指揮胡昂起立房屋，住坐管業外；置買後所舍人劉廣、本家弟周琦小西門外鋪房二間，與女婿舍人黃仕信供給紙筆。後不許爭論，已為管業。

這兩個嫁入武官家庭的女兒，都只獲得少量的住屋或鋪房。至於她們在出嫁時是否曾獲得妝奩田或陪嫁家人，已不得而知。

周瑞死後，指揮僉事職位先後由瑞長子嵩、嵩長子承芳、⁶³ 次子承勛、三子承緒、承芳子相、承勛子楫、楫長子煥文、煥文次子于璧及三子于圻承襲。⁶⁴ 他們在赴京襲職時，依例都是由朱姓家人陪同，襲職後也都獨享五大房家人的服侍。至於「應襲」以外的其他族人，例如周崇等人的子孫是否仍分配有家人，〈關約〉中另有周承旦與妻賀氏為所生三子立下的分關書，由之可以一窺端倪。

周承旦係周崇獨子。所生三子為周樞、周拱、周梅。萬曆二十年立分關時，周梅已身故，遺子士章兄弟三人。分關書因此以樞、拱、士章兄弟為對象，將所有家產「三股均分」。表三所示即周承旦遺產中不動產之分割狀況。

表三：萬曆二十年周承旦分關書子孫承分表

	周樞	周拱	士章兄弟
湘潭縣	間山丁家灣田 4.885 石 二十三都桐梓衝田王家 門首上段田 5.63 石、下 段在李家門首田 3.5 石	楊柳塘羅家壠田 5.37 石	間山陳家灣田 5.73 石 二十三都梓木衝趙家 門首田 4.63 石、易家 門口下段田 3.5 石
甯鄉縣		白馬塘田 6 石 ⁶⁵	
長沙縣	石牯牛塘衝上段田 4.5 石 馬頭陂下段田 3 石、吳 家田 0.4 石	嶽麓山萬家衝田 4.63 石、下段陳家門首田 3.215 石	石牯牛塘衝下段茅栗 塘田 1.6 石、王田 2.425 石、斑竹塘田 1.33 石
以上 田產共	19.215 石	19.215 石	19.215 石
房產	長沙縣石牯牛塘衝祖屋 三棟、書房二間	長沙按察司後祖屋二 棟、書房二間、鋪面 二進	善化縣後祖屋三 棟、面前鋪店

⁶³ 康熙《長沙府志》（蘇佳嗣纂修，二十卷，據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影印，《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37，北京：中國書店，1992），4：11b，〈兵制志〉記有長沙衛指揮周承芳，下註：「歷任遊擊」。

⁶⁴ 參見《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源流總序》1：1a-6a。

⁶⁵ 第一次分關書將白馬塘列入湘潭縣下，第二次分關書卻列於甯鄉縣下，可能因為地在兩縣交界之處的緣故。白馬塘所在的間山，或即第八支家人群居之澗山；澗山在善化縣西七十里，地居善、潭、甯三縣交界處。參見光緒《善化縣志·山川·山》4：9a。

與表一、表二相較，可知周崇承襲的祖產，主要在湘潭縣間山羅家塘、白馬塘及長沙縣石牯牛等地；他與承旦私置的田產，則分散在湘潭縣間山丁家灣、陳家灣，二十三都桐梓衝、梓木衝及長沙縣嶽麓山等地。這些土地分隔各地，或委由佃戶耕種，但不論收租、管理，在在都需要家人的協助。也因此，分關書載明周承旦名下「其餘什物等項，以及使用人均作三股均分，並載田單內」。「使用人」即「家人」，⁶⁶ 由之可以確知，周崇當年分配得的家人周通、周辛、周位、周敬、琴童五房以及周全禎全房一大房，兩代之後仍是當作私人財產的一部分，均分給後代子孫的。可惜的是，這部分的明細卻是「載田單內」，今人不得其詳。但由家人附記於田單之內，不難瞭解家人與田產的關係密切，甚至不無可能這些土地中，有部分原本即為這些家人的財產，雖被投獻到周家，仍由原持有者實質參與耕作。至於周氏族人自行購置的田地，實際耕種者大抵皆為佃戶，但對於個別地塊的管理，則採取責任制，指派特定家人代主收租管業。

周樞死後無子，「所遺田山蕭家塘基地、園土、池塘等項」，由拱、梅後代立為公業。⁶⁷ 猜想周樞名下的家人，大約也於此時由拱、梅二房接收，均分使喚。

除去這些分配給眾子孫使用的家人外，周瑞在第二次分關書中，還指派了周界與周傑二全房人口看守父母墳地，並且立為定規，永遠遵守。《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卷三，〈守墳田〉有云：

湖濱渡額有守墳弓口田一十二畝，原係公眾家丁周倌、周良弼、梁材、良貴耕種。其租則聽家丁自收，以作衣食之需，逐年僅交每房新米二斗，四大房共米八斗、蘿蔔八斗。今丁絕，令佃文子信，但山地寬數里許，前萬曆甲子為羅、鄧、李盜葬，合族赴告巡道。……今以外姓看守，前弊似亦難免，後之子孫慎之。

這些被稱為「公眾家丁」的周倌、周良弼、梁材、良貴等，應即是周界與周傑的後代。他們平時負責守墳，耕種守墳田；遇祖宗祭祀之期，則需「馳傳帖通知各房，令本房之長者遍傳之四大房」，俾使四大房能照依輪流順序，先期準備祭祀

⁶⁶ 周承旦分關書見《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關約》12：12a-14a。分關書開宗明義即謂：「因家務浩大，請親族周西槐……陳四知等，將祖遺田產並私置田業、房屋，家人、什物等項，作三股均分，各自管業食用」。

⁶⁷ 參見《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合約》12：14a-16a。

所需。⁶⁸ 守墳田的租入，除供守墳家人自用外，每年尚需提供四大房米、蘿蔔各二斗。崇禎年間因丁絕之故，守墳田改由外姓看守佃種，成為周氏子孫心腹之憂。

對於家人的管理，《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卷一，〈舊譜原訓·原訓二條〉有云：

公議通族家丁繁眾，中間守法者固多，玩法者間有。或因主幼懦而悍僕欺凌，或分彼此而縱僕犯上。或因伴交鬧而禍及主人，或酗酒無故凌辱主輩。前犯姑記，今後各房家丁，凡遇主輩，俱宜安分奉事。如有使酒犯上，用言抵觸毀罵等情，許受辱親丁，鳴知通族戶官，齊集宗祠，依律重治。其中強惡不服懲治者，通族連名盾之官府。若本主徇情姑息，即以縱僕之罪罪之。各主省令各僕遵守盟示。

可知對於玩法犯上的家人，輕者由通族戶官齊聚宗祠私刑處置，重者告官嚴刑不貸。但其中必有聽命於惡主者，因此對徇情姑息的主人亦坐以縱僕之罪。

三·家人、義男對軍戶「戶」、「籍」與「家族」的影響

以家人、義男承充軍役的紀錄亦見於衛選簿。⁶⁹ 例如《南京留守後衛選簿》火應丙名下「外黃查有」：

火平，三河縣人。有父火得興，洪武二年蒙華都督收集，就頂義祖父郭當住名字充軍。二十七年因父老疾，將平戶名不動代役。

火得興係郭當住義男。洪武二年華都督收集舊部當軍，⁷⁰ 郭當住以火得興頂己名

⁶⁸ 參見《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舊譜原訓·原訓一條》1：6a-7a。

⁶⁹ 明代設衛所於全國，衛所武官大體上都是世襲的。管理武官陞調襲替的方法叫做武選，衛選簿記載的便是衛所武官武選的記錄。武選時為核定武官資格，需先審取武官從軍履歷，齎赴內府，與貼黃互相查對。下文中屢屢出現的內、外黃，是即所謂貼黃。但貼黃除內、外黃外，又有所謂正黃，平時鎖在內府銅匱之中，輕易不能得見；內、外黃則收貯於內府印綬監，記載的內容包括各「腳色」的「姓名、舊名、年甲、貫址、從軍歸附來歷、征克地方、殺獲次數、受賞名目、陞授職役、調守衛所并給授誥敕」等等，詳細討論參見于志嘉，〈從衛選簿看明代武官世襲制度〉。

⁷⁰ 明代軍戶來源有多途。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4-5即指出：明初因統一事業持續進行，對已收復的各地若有舊勢力之部隊殘餘下來，常委任原管官回原籍收集，用以充軍。其例如《明太祖實錄》50：5a，洪武三年三月壬子：「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奏請收集故所部合肥軍士赴本衛調用。上從之，凡得一千八

充軍。二十七年得興老疾，復以己子火平繼役。後火平因靖難功欽陞廣武衛左所副千戶，永樂三年欽與世襲 (74：232)。⁷¹

同樣的情形亦見於杞縣人劉成，「甲午年頂義父徐二名充軍」，死後由己子劉義補役。劉義於洪武二十二年併鎗勝，⁷² 陞小旗，後以靖難功陞至指揮僉事。永樂初，復姓劉 (74：296)。又如建安縣人岳福，明初頂義父李福祐名字從軍，洪武二十二年併鎗陞小旗，將子岳青選充演武餘丁。二十六年岳福老疾，以青戶名不動代役。岳青後以靖難功陞寬河衛右所正千戶，永樂三年與世襲 (74：402)。又一例「耿榮，宿遷縣人。有父耿自當，頂義祖父黃喜同名字，辛丑年充軍。洪武二十年故，將兄王興戶名不動補役。三十二年居庸關陣亡，將榮補役」。耿榮後以靖難功陞至鷹揚衛前所副千戶，永樂三年與世襲 (50：444)。

上舉諸例皆係於元末明初動亂之際，被指名充軍之人為逃避軍役，以義男頂替自己姓名充役，繼而又以義男之子「戶名不動」繼役。⁷³ 四例且皆於義男第二代時因靖難功陞為武官，於永樂三年獲得世襲資格，同時申請復姓獲准。從此斷絕了義父子孫爭襲武職的機會。

受衛選簿資料性質所限，郭當住、徐二、李福祐、黃喜同四人是否另有親生子無從得知，火得興、劉成、岳福、耿自當成為義男之途徑亦不詳，很難作進一步的分析。但衛選簿中仍有部分資料對義男身分來源有清楚說明。例如咸寧縣人宋得，「的姓王。先年間過房與軍人宋仲仁為義男，就頂義父姓代當軍役」。永樂元年歷功陞至羽林前衛指揮僉事，復姓名王得 (49：396)。南陵縣人鄭敬，「有義父徐人四，丙申年 (1356) 充軍」。甲辰年 (1364) 鄭敬隨母改嫁徐人四，「就隨姓徐」，名神保。「十八年義父病故，將神保戶名不動補役」。後神保以靖

百八十七人，置百戶一十七人，就令統詣廣西守禦。」

⁷¹ 括號內數字 74：232，係指資料出自《中國明朝檔案總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第 74 冊，頁 232。以下同。

⁷² 明代衛所武官襲替需通過比試，相關討論參見于志嘉，〈從衛選簿看明代武官世襲制度〉，頁 45-46。總小旗補役，則需「以併鎗勝負為陞降。遇有應併人役到部，照比試例，行移會官，於中軍都督府前監併。其分別勝負，亦與比試同」。「（洪武二十六年）又定：總小旗缺，務選年深精壯勇敢軍人、小旗併鎗。軍人併鎗得勝陞小旗，小旗併鎗得勝陞總旗」，劉義即以軍人併鎗勝陞小旗者。參見萬曆《大明會典·兵部·武選清吏司·銓選四·旗役陞用併鎗附》121：1740-2~1741-1。

⁷³ 明代軍戶常以頂戶名充軍或戶名不動方式代役，參見于志嘉，〈論明代採集軍戶的軍役更代——兼論明代軍戶制度中戶名不動代役的現象〉，《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35-85。

難功陞至指揮使，復姓名鄭敬（56：398）。又如清江縣人楊清，「嫡〔的〕姓王，先年隨母改嫁楊人為妻」。楊人於洪武五年從軍，死後將義子楊清隨姓補役，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陞副千戶，復姓王（61：339）。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二例。無錫縣人濮祥，丙午年（1366）軍。濮祥疾，以弟濮阿住代役。濮阿住死，濮祥將先年被其拘擄為義男之雲南陽宗縣人尹貴，改「作濮清姓名代充軍」。濮清征進有功，歷陞至指揮僉事，永樂九年「具啟改正復姓名尹貴」（56：200）。鳳陽縣人周原，「乙未年（1355）被胡祥拘為義男，丁酉年（1357）作胡原從軍」，後因功累陞至副千戶，年老退職，永樂十九年以嫡長男周旺替襲副千戶（52：153）。尹貴與周原皆因被拘擄而為義男，情況甚至比賣身乞養者更悲慘，自然也不在法律允許的收養義男範疇（詳下）。但或因被拘擄為奴的時間早於律法的訂定，或因軍中需人孔急，並不特別查核，二人遂皆以頂姓充軍方式，順利蒙混過關。⁷⁴ 這也正突顯了軍役的特殊性，為確保軍役不缺，對充軍人數的掌握更勝於人道的考量。

衛選簿中還有部分資料顯示出，若干以義男代役者本身並不乏嗣，一旦推給義男承充的軍役有時還會被迫討回來。例如《越嵩衛選簿》試百戶陳爵下：

四輩陳瑛，舊選簿查有：正統三年十二月，陳瑛年十八歲，係越嵩衛河南驛擺站世襲百戶陳貴嫡長孫。祖先將義男費冬保朦朧作嫡長男陳良，告替職事，後為不孝，問發充軍外，欽准本人照例替職。

從陳爵名下的「外黃查有」來看，陳氏軍役緣起於和州人陳禮，「乙未年從軍，洪武六年充小旗，十二年充總旗，二十二年以年深署鎮海衛前所百戶，二十三年除試百戶」。陳禮死後，嫡長男陳貴於洪武二十七年襲除鎮海衛世襲百戶，三十年調越嵩衛（四川行都司屬衛）河南驛。洪熙元年，陳貴將義男費冬保冒作嫡長男陳良，告替世襲百戶職事。後費冬保因不孝問發充軍，正統三年（1438），欽准陳良嫡長男陳瑛照例替職（58：112）。

費冬保替職時，陳貴已具有世襲武官的身分，可能因越嵩衛一帶局勢動盪不

⁷⁴ 據楊一凡，〈《大明律》考〉，《洪武法律典籍考證》，頁1-68，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自立為吳王時，就很重視立法工作，自吳元年（1367）十二月草創律、令，洪武元年（1368）正月頒行天下，至洪武三十年完成《大明律》的最後定本，其間幾經修訂。周原被拘為義男時間在乙未年，代役在丁酉年（1357），時間過早姑且不論；尹貴被拘為義男時間雖不詳，但從濮祥從軍在丙午年（1366），其後又一度以弟濮阿住代役，待濮阿住死，始以尹貴補役，推測時間當在〈洪武元年律〉訂定後。

安，⁷⁵ 不捨嫡子冒險犯難，才以義男冒代。不想襲替百戶的費冬保全不知感恩圖報，終以不孝問發充軍，世襲武職終究回歸陳貴嫡系，由嫡長孫陳瑛襲替。

《越嵩衛選簿》又有一例，見衛鎮撫徐上達名下「外黃查有」：

徐信，崇陽縣人。祖父徐德，充袁國公下院判。吳元年選充崑山衛千戶所鎮撫，八月授衛鎮撫，六年為事充軍，故。將家人徐善孫補役。有伯徐富，因家道消乏，愿告投軍。十年，取襲鎮撫。二十四年故，無兒男，兄徐忠襲衛鎮撫。三十一年為盜事發威虜衛充軍，三十三年白溝河陣亡。無兒男，信係親弟，三十四年襲授世襲衛鎮撫。徐虎係徐信親弟，虎於永樂二十二年襲，調越嵩衛衛鎮撫。

此例徐德至少有兩個兒子。他於吳元年八月授衛鎮撫，洪武六年為事充軍，死後將家人徐善孫補役。但徐德充軍後家中經濟艱困，親生子徐富情願投軍，於是從徐善孫手中取回軍役。徐富後於洪武十年襲鎮撫職，死後因無兒男，由親弟之子徐忠、徐信、徐虎先後繼襲衛鎮撫（58：64）。

上舉二例是已具有衛所武官身分者以家人、義男繼役，又因故自行請求取回軍役，顯示二者原本有藉家人、義男避役之嫌；反悔後並未因之受到處分，應與政府對自首者從寬的態度有關。

相對於陳貴、徐德為避役而以家人、義男代役，有些人家確實因為乏嗣不得不以義男代役。例如《燕山左衛選簿》，董紀「外黃查有」：

趙成，有妻父趙自當，山後人。洪武三年充軍。妻父故，成補役，十三年調燕山左衛後所，三十二年克雄縣，……三十五年渡江陞六安衛前所正千戶，永樂二年與世襲。遠年間，父董旺將成與趙自當作義男。父充軍，故，成隨姓補役，復姓董。永樂四年改正。

此例趙自當原為趙成的義父，後又將女兒許配給趙成。洪武三年趙自當充軍，死後以趙成補役。趙成後因靖難功陞正千戶，永樂二年欽與世襲。趙成的親父董旺亦為軍人，充軍時間不詳，但就在趙成升官後不久死亡，因別無他子，遂將趙成隨姓補役，復姓為董。永樂四年，將趙自當名下軍役開除，董成之役則改正在董旺名下。由於軍功為董成本人所獲，所陞武職由董成子孫承襲（51：209）。

⁷⁵ 據《明太祖實錄》219：3a，洪武二十五年七月丙午：「置越嵩軍民指揮使司於邛部州，命指揮僉事李質領謫戍軍士守之」。翌年正月置越嵩衛，見同書 224：1b，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庚戌。設衛之後，該地區仍不時有番賊出沒，參見《明太宗實錄》25：2a，永樂元年十一月己卯。

董成以趙成之名先補義父妻父軍役，其後又復姓名為董成改補親父軍役，其程序符合下舉清軍條例的規範。萬曆《大明會典》卷一五四，〈兵部·武庫清吏司·軍政一·勾補〉宣德四年令：⁷⁶

凡義男女婿有代義父妻父之家為軍者，有故，止許於義父妻父之家勾取。

如係戶絕，覈實開除。若自幼過房出贅，各家俱屬正軍無丁者，以妻父義

父之家為戶絕，還繼本宗。如本宗係民，仍補義父妻父軍役。

由條例中明定「如本宗係民，仍補義父妻父軍役」，不難瞭解人為軍籍義男或娶軍家女的民籍戶丁，是有可能為延續義父妻父家的軍役，被迫落入軍籍的。

再以金吾右衛前所革發百戶閻資為例：

內黃查有：閻喜兒，含山縣人。有義外祖徐都賢，丙申年從軍，洪武十四年因老，將義父閻狗兒戶名不動代役。三十二年真定陞勇士小旗，鄭村堪陞總旗，三十三年白溝河陣亡，仍將義外祖襲陞百戶。永樂七年故。喜兒係狗兒義男，永樂九年四月初七日敬襲金吾右衛前所流官百戶，以繼其後，不許出姓。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閻資，年四十一歲，含山縣人，係金吾右衛前所帶俸年老實授百戶閻雄嫡長男。伊義高祖徐都賢從軍，老，義高祖閻狗兒歷功陞總旗，白溝河陣亡，仍將義外曾高祖徐都賢襲陞百戶，故。伊曾祖貴，幼名喜兒，係閻狗兒義男，隨姓繼後。祖英、父雄沿襲。所據閻狗兒歷官職，本舍曾祖貴係義男異姓之人，例難承替，照例革發，本衛隨住。

此例祖軍徐都賢應無子嗣。所生一女，嫁與閻狗兒為妻。徐都賢在洪武十四年時，一度因年老退役，由女婿閻狗兒代役。後狗兒於靖難之役中陣亡，徐都賢則因其陣亡功襲陞百戶。狗兒亦無子，收喜兒為義男。永樂七年徐都賢身故，遂以閻喜兒襲百戶職。由於軍功出自閻狗兒，規定繼其後的喜兒「不許出姓」。喜兒之後，又繼襲了閻英、閻雄兩代，至閻雄之子閻資擬繼襲時，已是嘉靖二十二年。武選查出閻狗兒陣亡功所陞官職，非「義男異姓之人」所能承襲，⁷⁷ 閻資遂遭革發，從此失去繼襲資格 (50：487-488)。

⁷⁶ 此令雖繫於宣德四年，但由董成之例推測，該條例之成形至少可往前推到永樂初年。

⁷⁷ 據萬曆《大明會典·兵部·武選清吏司·貼黃》122：1752-2，「（永樂）十一年，令新官義男女婿，例襲流官一次，不許出姓。有擅改姓名，詐冒承襲者，處極刑；首告者給賞」。閻喜兒因義父靖難功襲職，是所謂「新官」。他於永樂九年襲流官百戶職，按例只得襲一次；或因任內改為實授百戶，閻英、閻雄兩代武選時未被查出，以致又繼襲了二次，到嘉靖二十二年始遭革發。

當然，衛選簿中也不乏以義男補役不成，被要求改正的例子。例如《金吾右衛選簿》副千戶周文名下「內黃查有」：

周興，巢縣人。父周全，洪武元年從軍，撥大興右護衛，改燕山右護衛中所。為父老疾，將義兄李得兒代役。為因異姓，興改正替役 (50：314)。

又如藤縣人朱成，丙午年歸附，調燕山前衛左所。後因「年老，將義男朱來興代役。不許代役」，取姪朱斌代役 (52：95)。至如建平縣人楊三，則在被糾正後憑空又折損了一名義男。蓋楊三於乙未年歸附，死後將義男弋福興補役。洪武十五年「為因異姓」，以楊三子楊清「改正」，二人「各另當軍」 (55：49)。

類似的情況亦見於《西安左衛選簿》，蔡朝勳名下「外黃查有」：

蔡完，高郵州人。有祖父蔡文貴，先係張氏百戶，丙午年歸附，吳元年充總旗，老。有父蔡整年幼，告令義伯蔡保併充總旗。有伯為係異姓，父出幼長成，貳拾叁年告准，令義伯充總旗，父併補祖役。當年以年深總旗起取赴京，除漳州衛世襲百戶。

張士誠舊部蔡文貴歸附從軍後充總旗，年老時因子蔡整年紀尚幼，遂以義男蔡保告補總旗。蔡整出幼後告准併補父役，但蔡保並未因之除役，仍充總旗。同年起取年深總旗赴京，甫補役的蔡整獲得赴京資格，並因此除世襲百戶 (56：171)。

蔡保、費冬保、徐善孫的例子說明義男在軍役承襲上是一枚活棋，由於主家另有子男，其為奴僕之身分明顯。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武驤右衛選簿》，呂玉名下「外黃查有」：

呂貴，戶名韓保兒。有父呂義安，自幼與韓北兒家作義男。洪武元年收集軍士，將父呂義安頂替義叔祖韓留住名字，充薊州衛軍，故。義叔韓保兒補役。義叔老疾，將貴代役。

韓保兒為韓留住之子，韓留住與韓北兒應為兄弟。呂義安自幼「與韓北兒家作義男」，洪武元年收集軍士時又頂替韓留住充軍，其奴僕身分殆無疑問。呂義安死後，或因子呂貴年紀尚幼，一度以韓保兒補役，但在韓保兒老疾時，又再以呂貴補役。呂貴後因靖難功陞太原左衛後所百戶，與世襲，但或因呂貴未得子嗣，實際承襲其職的是親姪呂興 (53：78)。

由上可知，明初以義男頂戶名或頂姓充軍的情況相當普遍，雖有部分被查出要求改正，更多的是持續以義男第二代第三代繼承軍役。這些義男或義男後代一

且因功得官，往往要求復姓歸宗，⁷⁸ 以免到手的官職遭主家奪去。但若軍功得自主家，因故暫由義男襲陞官職，主家得隨時取回，由親子孫承襲。⁷⁹ 另外一種情況是武官老疾無子奉養，因而以義男替職為己養老者；⁸⁰ 這與將士因功死亡的狀況相同，只准義男襲陞一次，帶有優恤武官家屬的意義，也因此規定襲職者不許出姓，必須「隨其姓氏，以繼其後」。諸多狀況各有不同，但以義男頂、繼軍役，勢必對軍戶戶籍制度乃至家族結構帶來影響。本文最後，擬就此略做討論。

首先是對「戶」的影響。家人、義男皆可視為擬制性的家族成員，但明初律法沿襲唐宋以來只許收養三歲以下遺棄小兒，否則論罪的精神，對於「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以及「以子與異姓人為嗣者」，都處以「杖六十」之刑，乞養之子「歸宗」。這種情況並且延續到明代中期才開始改變。⁸¹ 《明英宗實錄》卷四四，正統三年七月乙巳有云：

左通政余可才言：軍民無子者乞養義男，及已成立，多告發斷離。如此則孤獨之人必至失所。上命除追陪稅糧等項，該贖還人口外，其餘男女已成婚配，及初願過房乞養者，不許告許追理。違者罪之。

《明憲宗實錄》卷二五六，成化二十年（1484）九月乙酉朔亦云：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劉魁言五事……一，浙江軍民有無子而與女婿義男共力起家者；有女婿義男因妻父義父微業起家，不忍背去者。而同宗之人次應承繼，往往利其財產，計囑官府，引例告爭立繼。既得其財產，多有不念其起家艱難，而浪費所有。既正其名分，多有不遵其教令，而虧損孝道。甚至憑藉本生父兄勢力，制其所後之親；絕其親屬交際，而不許往來；逐其義男女婿，而不得同處；節其衣服飲食，而不容其典賣田宅。其間又有同胞兄弟、同服之親，幸其無子，而不以子繼之，待其死，則逐其妻女養

⁷⁸ 亦有義男頂名充役，陞官後不再復姓者，例如崑山縣人虞官一，丙午年頂義父闕昇一名字從軍，洪武八年老，子「虞旺作闕成名字補」。闕成後以靖難功陞副千戶，子孫襲職俱仍闕姓（61：393）。

⁷⁹ 例如西安縣人趙真保，乙亥年充軍，靖難間歷陞至副千戶，洪武三十四年夾河陣亡。庶長男趙青年幼，以真保義弟趙武能借襲，陞金吾左衛指揮僉事。永樂四年趙青告取職事，五年奉勘合准與指揮僉事俸優給，義叔在閑。永樂九年趙青襲授指揮僉事（53：18）。

⁸⁰ 例如平涼衛前所正千戶殷勝，有義男殷興，宣德四年因殷勝「別無應替弟姪兒男」，欽准殷興「替流官職事壹次，隨其姓氏，以繼其後。不許出姓」（56：253）。又如滄州人韓俊，為留守左衛右所世襲正千戶韓禮義孫。韓禮「老疾無兒男」，韓俊「該替流官一次」。至成化十六年，韓俊六十一歲，亦以老疾「照例全俸優養」，並未准其子孫襲替（54：44）。

⁸¹ 參見樂成顯，〈明清徽州宗族的異姓承繼〉，《歷史研究》2005.3：85-96，頁94-96。

子，而併其財產者。伏觀律令，乞養子孫亦有合得財產，養老女壻亦得與繼子均分。子孫不孝，罪無親生、過繼之別。今後立繼，服無相應者，宜聽擇其次。繼子不得乎所後之親者，聽其別立。若義男女壻宜所後之親者，聽其相為依倚。無子之人家貧者，聽其賣田自贍。……戶部議：其言宜從。詔可。

劉魁的建議其後更形成條例，在弘治十三年議定頒行的《問刑條例》中定著下來：「若義男、女壻為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為依倚，不許繼子并本生父母用計逼逐。仍依《大明令》分給財產」。⁸² 萬曆十六年，三法司申明律例未盡條款，更在乞養義男之外，針對財買義男定下新題例：「財買義男如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⁸³ 不但在法律上確定了財買異姓義男的合法性，更大幅提昇了義男的身分地位。

另一方面，由於因「無子而乞養異姓子承繼」者始終存在，政府基於賦役徵收的考量，允許義男「承籍當差」，⁸⁴ 因此在明代的戶口清查中，義男是作為家

⁸² 參見姚思仁注，《大明律附例注解》（三十卷，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藏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叢書·明清史料叢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4：5b-6b，〈戶律·戶役·立嫡子違法〉。汪慶元，〈明代徽州“義男”考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1：100-106，頁100將此條誤植為萬曆十三年。相關條文又見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4：461-464，〈戶律一·戶役·立嫡子違法〉。

⁸³ 參見姚思仁注，《大明律附例注解·刑律·鬪毆·奴婢毆家長》20：12b；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刑律·鬪毆·奴婢毆家長》20：836。新題例緣起於萬曆十五年十月丁卯，「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等申明律例未明未盡條件。一、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謂功臣家方給賞奴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雇工人，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且雇工人多有不同，擬罪自當有間。至若縉紳之家，固不得上比功臣，亦不可下同黎庶，存養家人勢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有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皆以雇工人論；有受值微少，工作止計月日者，仍以凡人論。若財買十五以下，恩養已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在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論，在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得旨：律例未盡條件，還會同部寺酌議來看」（《明神宗實錄》191：6a）。至次年正月庚戌定例：「刑部尚書李世達、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寺卿孫鑣等，題申明律例未盡條款凡六事。一、奴婢，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議有年限者，以雇工論。只是短雇，受值不多者，以凡人論。其財買義男，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同子孫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家以雇工論，縉紳家以奴婢論。……上允行」（《明神宗實錄》194：9a）。由吳時來等人對財買義男年齡的討論，亦可知明初只許收養三歲以下遺棄小兒的規定，早已不復遵行。

⁸⁴ 樂成顯整理萬曆年間徽州府休寧縣里仁鄉二十七都五圖的黃冊底籍，將各戶長姓名與前一屆大造時相比，挑選出發生變化者考究其繼承關係，發現以義男繼義父戶籍者共十五戶，其數量僅次於以子承父的三十四戶，及以弟繼兄的十七戶；多於以侄繼叔的十四戶，以孫

庭正式成員登記在冊的。例如，許文繼引《萬曆二十七年大造（徽州府休寧縣里仁鄉）二十七都五圖黃冊底》，其中一戶朱添資，萬曆十年時戶下實在男丁二人，一為九十五歲的朱添資，一為二十九歲的義男朱伯才。萬曆二十七年朱添資故，三十年的黃冊底遂以「朱伯才承義父朱添資」，為「甲首第八戶」。很明顯，這裡義男朱伯才的身分等同於繼子。⁸⁵ 異姓義子入繼後，一般皆改從義父之姓；但在義父死亡，改由義子「承籍當差」後，不少義子選擇恢復原姓，這就使得原屬某姓的戶籍，輕易的落入他姓之手，甚者促成各姓勢力此消彼長的結果。⁸⁶

同樣一批徽州黃冊文書中，許文繼引用的另一個例子裡，義男的身分就與繼子無關。其例見《萬曆叁拾年大造貳拾柒都五圖黃冊底》：

一甲排年 王茂 軍
 開除 成丁一十口
 義男金運廿七年故
 實在 人口六十六口 成丁三十九口
 義男得忘卅十〔歲〕 義男婢妾廿七〔歲〕

許文繼的引文省略了與義男無關的部分，單憑此無法看出王茂的家族結構，但由戶下人丁眾多，且義男不只一名，甚至有以婢妾為名者，不難想像此義男應與承嗣入繼無關，應為奴僕之屬。王茂是軍籍，戶下多名義男平日可以供差遣；萬一衛所軍額出缺，回原籍清勾，亦可確保隨時有義男可以應勾補；衛軍軍裝需求也可由義男負責供送，王茂以原籍軍戶畜養多名義男絕非特例。

繼祖的十一戶。若與以甥繼舅的二戶、以婿繼岳的一戶相比，數量明顯偏高。參見氏著《明代黃冊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1998 初版〕），頁190。

⁸⁵ 參見許文繼，〈“義男”小論〉，頁103。

⁸⁶ 例如樂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增訂本）》，頁190，引《萬曆拾年大造貳拾柒都五圖黃冊底》中「一戶朱社嵩，原籍故義父汪起。……本身原係本甲朱嵩戶次弟，係萬曆四年來繼義父汪起為嗣，今承籍當差」。據汪慶元，〈明代徽州“義男”考論〉，頁103，「朱社嵩名義上是“來繼義父汪起為嗣”，但其人丁事產均係由兄朱嵩戶“轉除”而來；承戶後，義父汪起舊管人丁二口已經“開除”，其“轉收”土地三十六畝均係萬曆元年至十年購買得來」。由於「朱社嵩戶和原來汪起戶已經沒有任何關係」，汪慶元因此論斷：「這種情況只是黃冊制度為了保持里甲戶頭穩定而實行的新立戶籍的一種形式」。其說值得重視。《徽州府休寧縣里仁鄉二十七都五圖黃冊底》筆者未見，從汪慶元整理的有限資料（參見該文頁101附表），無法得知汪起卒年以及朱社嵩入嗣時的年齡，當然也無從判斷朱社嵩入嗣究竟是被官府所迫或出於主動。但朱社嵩在承籍當差後復姓，加上同甲內原有的朱嵩戶，使得朱姓在甲內的影響力大增，卻是不爭的事實。

家人的情況又如何呢？含山伍氏戶下的二潘一孔，與伍氏諸子以戶股的形式結合，共同承擔軍民二役，由於立約時是議定以之「姓伍姓，當伍姓差役」，在各種賦役黃冊上應該是以伍潘某、伍孔某的名字登記。也就是說，即使賦役黃冊不明記其為家人，不明底細者未必能看出二潘一孔其實具有家人的身分，但家人確實存在於其中，並且受到官府的承認。極言之，對於像含山伍氏這樣迫切需求家人協助賦役支應者而言，將家人列入戶籍登錄中，毋寧是保障自身權益的必要手段。

順帶一提，在明代江南賦役負擔沈重、飛灑詭寄盛行的地區，為使概縣田畝俱能各歸其戶，花分詭戶無所遁形，有「以保甲之法，挨圩逐戶，細查其名號、年歲、職役、生理、宅舍、田園、男女奴僕，置煙門冊」以管理戶口的方法。⁸⁷ 萬曆二十九年任吳江知縣的劉時俊，⁸⁸ 在所著《居官水鏡》卷三，〈告示類·清理煙門示並式〉中，記其於任內所頒造煙門冊之法，⁸⁹ 乃是以圩甲為單位，「各

⁸⁷ 參見劉時俊撰，孔貞時輯，《居官水鏡》（四卷，據明萬曆刊本影印，《官箴書集成》1，合肥：黃山書社，1997），1：26b-28a，〈修塘事宜·通申刊冊·一免役〉。是書輯有劉時俊在廬江、桐城、吳江知縣及南京刑科給事中任內的公移、告示、批參、讞語等，對吳中賦役徵收著墨尤多，頗具參考價值。

⁸⁸ 劉時俊，字勿所，又字夢胥、恒甫。四川富順人，又謂隆昌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二十七年任廬江知縣，二十八年轉任桐城知縣，二十九年調吳江知縣。在吳江五年，治效異等，曾捐俸築平望堤八十里，障蘇湖、太湖，邑民呼劉公堤，立祠奉祀。後陞南京刑科給事中，進階太僕寺少卿，歸里。天啟元年，蜀永奢叛重慶，奉旨贊畫川湖雲貴軍務，招兵助練，恢復重慶。崇禎二年贈兵部尚書。以上參見康熙《廬江縣志》（吳賓彥修，王方歧纂，十六卷，據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影印，《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20，北京：中國書店，1992），9：8a，〈秩官〉；道光《桐城續修縣志》6：7b，〈職官表〉、9：4b，〈人物志·名宦〉；乾隆《吳江縣志》（陳笈縈等修，倪師孟等纂，五十八卷，首一卷，據清乾隆十二年刊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163，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23：63b-64b，〈名宦〉、19：9b，〈長官〉；乾隆《富順縣志》（李芝、段玉裁等纂，二十七卷，首一卷，據清光緒八年重刻乾隆四十二年本影印，《西南稀見方志文獻》15，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9：9a，〈治行〉。又據《明史·地理四》43：1035，隆昌在敘州府東北，本富順縣隆橋馬驛，隆慶元年置縣，析榮昌、富順二縣及瀘州地屬之。劉時俊當由富順析入隆昌者。

⁸⁹ 關於煙門冊，乾隆《吳江縣志·名宦》23：63b-64b，謂「時俊為政，明徹簡捷，務理大綱。往時催科，惟以盈為辦，然點者善負，姦吏復陰比匿賦，而馴民致有十限三分之輸。時俊先造煙門冊，凡田畝、貫址、戶口，令民占實填報，取以簡稽，遂悉田賦利病」。乾隆《江南通志》（尹繼善等修，黃之雋等纂，二百卷，首四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07-51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13：64b，〈職官志·名宦〉則云：「時俊……萬曆中知吳江，下車即令民具沿門冊，就冊摘大數，

圩發印冊一本」，由各圖里長「類領散給，各圩長照冊填註」。其式如下：

一、正戶共幾十戶

一戶，姓某，名某，又名某，字某，號某，係某子。年幾十歲。某職分，某生理，居住某地方，^瓦_草屋幾間，庄田幾處。子幾人，名某、名某。男僕幾人。女僕幾口。

一、副戶共幾戶

一戶某，原姓某，原名某，係某戶人，見為某戶義男。年幾十歲，某生理，住居某地方，^瓦_草屋幾間，庄田幾處。子幾人，名某、名某。男僕幾人，⁹⁰ 女僕幾口。

所謂「正戶」，「不論士夫舉監及有田人家皆是」。「副戶」則「凡官戶知數、⁹¹

歷舉其隱罪，人以為神」。劉時俊自己則說：「煙門一冊，所包頗廣大。要在編保甲、正疆境、料戶口、定名分、清究盜、逐遊徒，六百里掌中制之，原不為一端設。然形露影附，執家園奴僕之實以稽田畝之所歸，而詭寄出矣；源窮派會，即戶冊鬼名歸煙門見在之實戶，而花分亦合矣。自是點巧閃幻之輩，數十年不知有役者，今適知有役，而法始公乎！人始快服云！」可知煙門冊之造，以保甲制為基礎，由於切實掌握了全縣人口地畝，在清究盜、逐遊徒的同時，也為吳江解決了長年以來役法不公的弊病。

⁹⁰ 引文中之「幾十」「幾」「某」字，係筆者參照《仕途懸鏡》（詳註 93）所加，《居官水鏡》原文俱為空白。又據〈清理煙門示並式〉61b：「開戶不照舊冊，亦不依戶名，須要的名的字的號。（中略）男僕幾人：名某、名某；女僕幾口。毋得錯漏」。可知男僕名字也是須要記錄的項目。其例如《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3：99-109，〈光緒五年祁門縣金壁坳戶口環冊〉，冊中印刷的部分雖只有：「夥計 人、奴僕^男 人、雇工 人」，實際填入後，成為「夥計王二一人」、「雇工李盛春一人」的形式。

⁹¹ 知數，顧名思義，指知數字、能算數之人。萬曆年間嘉興縣的里書稱知數，「知數之上有區書，區書之上有縣總」，參見崇禎《嘉興縣志》（羅烱修，黃承昊纂，二十四卷，據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明崇禎十年刻本影印，《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23：78b-82b，黃洪憲，〈與秀水郭中尊論田糧積弊書〉。知數之設，原本「不過欲其算撥錢糧，折註厰經，以便糧長之收銷，纂入會計，以助總書之發兌耳」，後因奸人嗜利，竟至弊端百出。參見萬曆《秀水縣志》（李培修，黃洪憲等纂，十卷，據明萬曆二十四年修民國十四年金蓉鏡校補鉛印本影印，《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3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3：8a-b，〈田賦〉。但〈清理煙門示並式〉中所謂的「官戶知數」，指的是官戶內的知數家人，康熙《無錫縣志》（徐永言修，嚴繩孫纂，四十二卷，清康熙二十九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30：5a，〈徭役·均田〉有云：「官戶各有知數家人一名，其戶下應完本折錢糧，知數自辦自收自比自收自兒」。乾隆《金山縣志》（常琬修，焦以敬纂，二十卷，首一卷，據清乾隆十六年刊民國十八年重印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405，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6：11b，〈田賦〉亦云：「隆慶初，分立官甲，以老人督催

人家義男，有田別居者皆是」。值得注意的是，〈清理煙門示並式〉對於與家主同居的義男，乃是將之「附在正戶男僕幾人之內，不另開戶」的，雖然這只是地方官員為確實掌握縣內人口地畝，以保甲制為基礎設立的煙門冊，⁹² 與以里甲制為基礎的賦役黃冊不同，⁹³ 但這種記載方式確也充分顯示出，在當時地方官員的認

之。先是，民間稱官戶有田在圖，上門守候，刁蹬煩難，頗為里長之累。至是，議分官、民為二甲，在民甲經催主之，在官甲每戶知數人一名，應完本折錢糧，自赴比較，仍以老人督催」。

⁹² 劉時俊的煙門冊，乃是以保甲制為基礎編造的，但不是所有實施保甲制的地區對於人口登錄都採取相同的態度。例如呂坤在山西推行的鄉甲制，主旨是以勸善懲惡的鄉約，配合緝奸彈盜的保甲；至於差糧徵收，則一以赤曆為本，催科仰賴「本約本甲互相勸說」。由於賦役不均的問題不像江南那麼嚴重，呂坤對於「一約之內人丁地土、貧富增消、差糧多少」，並不要求挨門逐戶的清理，而是訴諸神明，「只消本約誓神公定，掌印官斟酌」，即可以「審戶則、編均徭、派赤曆」。又因「縉紳舉監生員不須編入鄉約」，「樂戶、家奴及傭工、佃戶，各屬房主、地主挨查管束，不許收入鄉甲」，因此對人丁的掌控也不全面。以上參見《新吾呂先生實政錄》（七卷，據明末影鈔本影印，《官箴書集成》1，合肥：黃山書社，1997），頁467-470，〈民務卷之三·查理鄉甲〉；頁527，〈鄉甲約卷之二·鄉甲事宜〉。又，劉時俊煙門冊在正戶、副戶外另開有佃戶、浮戶。其中的佃戶包括「自己無田，佃人田種者」及「自己田少，兼佃人田者」，至少前者應是被鄉甲制排除在外的。而所謂浮戶，係指「無田工伴或別作生理，異籍寄居或開張鋪面者」，性質接近呂坤鄉甲制中包含的「匠作、裁縫、廚役、皂隸、快手、門禁、馬夫，但係本縣老戶人家，或客商經年久住，情願入約者」。由此亦可見不同地區的保甲制，基於不同的考量，對人戶管理有不同的作法。

⁹³ 萬峰，〈明代的義男買賣與雇工人〉，頁108，引王世茂，《仕途懸鏡·清理煙門示並式》2：22b-29b，認為「明中後期戶口分為正戶、副戶。正戶，不論士夫舉監，及有田人家皆是。副戶，凡官戶知數、人家義男，有田別居者皆是」，容易引發誤解。一如上述，將戶口分為正戶、副戶，是煙門冊而非賦役黃冊的作法；而《仕途懸鏡》此條，輯自劉時俊，《居官水鏡》，其實施範圍曾否擴及吳江縣以外的地區也有待進一步的考察。按：《仕途懸鏡》全名《新刻精纂詳註仕途懸鏡》，全書八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縮微膠捲，攝自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天啟年間梅墅石渠閣印本。是書纂輯有關明代地方吏治之文，每頁分上下欄。上欄有四六判語、讞語、參語、合律判語等項；下欄有新選州縣上府尊通用啟、筮仕始末、告示類公移指掌、告示活套、巡方總約、居官清事錄、政府集要、呂公政訓、牧民九要、牧民四慎、法家要覽等文。以上參見張偉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中國法制史書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6），頁144-2。纂輯者王世茂，字爾培，號養恬，江西金谿人。是書自序署明「書于三山車書樓中」，感謝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金文京教授賜告，王世茂車書樓是明代南京有名的書肆，三山是南京的三山街，街上書肆林立。杜信孚、杜同書著，《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北京：線裝書局，2001），〈江蘇省書林卷·金陵〉，收錄王世茂車書樓刊行書目共十二種，其中一種為王世茂輯《車書樓匯刻歷朝翰墨鼎彝》十卷，被四庫館臣評為「書肆射利之本」，大概可以代表主流學界對王世茂及其所輯書的看法。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永

知中，義男是等同於男僕的。而副戶中以義男為戶首，記男僕於其下的方式，似也反映出同樣具有男僕身分的義男，因為與家主關係密切，受到主家的信賴，而得以義男之稱統率男僕的一個面向。在這裡，義男地位相當於官戶中的知數，即所謂的「紀綱之僕」。⁹⁴

將有田別居之義男另立一戶登記在冊的保甲制又見於福建永春縣。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藏《嘉靖泉州府永春縣保甲文冊》殘卷，⁹⁵ 其中有九戶「養男戶」，⁹⁶ 八戶集中出現在陸柒都。⁹⁷

追查這八戶「養男戶」之所屬，一戶「林繼續（十六甲），民籍，係林一棋養男」；林一棋為吏員，「軍籍，係林洪戶丁」；林洪則為「本都里班」，其下

瑤等編撰，據萬有文庫版本印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193：4319。

⁹⁴ 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会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頁 257-258, 293，指出「知數」多由鄉紳的奴僕充當，為官戶中的管理人，紀綱之僕之屬。紀綱之僕的職務，包括佃戶管理、田地買賣、房屋管理、高利貸、商業經營、家屋的營運等，故亦稱「管事」。參見西村かずよ，〈明末清初の奴僕について〉，《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頁 257。

⁹⁵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藏《嘉靖泉州府永春縣保甲文冊》為一殘本。梁方仲，〈明代黃冊考〉，《嶺南學報》10.2 (1950)（收入《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264-300）誤以之為「嘉靖四十五年福建泉州府德化縣的黃冊原本」，後經樂成顯考證出實為實施於嘉靖間泉州府永春縣的保甲文冊。參見樂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增訂本）》，頁 98-120。筆者得京大金文京、岩井茂樹及夫馬進三位教授好意，得見此資料，特此致謝。

⁹⁶ 樂成顯整理該冊所載各類人戶，有里長（冊中多稱「里班」）戶、甲首戶、戶丁戶、衛所屯丁戶、外縣移居戶、義男戶及其他。其中的屯丁戶包括福州衛屯軍、興化衛屯軍，不僅可由之反證該冊絕非民黃冊，屯丁戶的存在也「反映了明代後期農村村落各種人戶雜處混居的一種實際狀況」，值得重視。唯本文重點在討論其中的義男戶，屯丁戶的問題姑置不論。謹轉引樂氏所做統計表以明各戶別數量及所佔比例如下：

戶別	里長戶	甲首戶	戶丁戶	屯丁戶	義男戶	移居戶	其他戶	總計
戶數	21	433	291	13	9	115	8	890
%	2.3	48.7	32.7	1.5	1.0	12.9	0.9	100

以上參見《明代黃冊研究（增訂本）》，頁 110, 293。

⁹⁷ 《嘉靖泉州府永春縣保甲文冊》為一殘卷，各頁首尾俱被截去，雖可按字跡及各甲排列先後順序判斷出所有文書分屬於七個都，但無法一眼辨識出各甲係屬何都。幸好同一里長名下甲首戶或戶丁戶有分住不同都者，例如在某都第二甲田頭村有「一戶吳有用，軍籍，係本縣捌都里班顏祖甲首」，由之可知記有「本都里班顏祖」者為捌都。以此類推，可知該文書除一都不明外，其餘分屬叁都、肆伍都、陸柒都、捌都、玖拾都、拾壹貳都。明代永春縣「併都分甲」的狀況參見樂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增訂本）》，頁 112-113。

「戶丁戶」⁹⁸ 至少有居住在十五甲的林一棋、林洪昭、林某，及十六甲的林大曜，俱為軍籍。又「一戶李欽華（十甲），民籍，里班呂大靜養男」；「一戶曾宜盛（十二甲），民籍，里班呂世貴養男」；「一戶王永德（十七甲），民籍，係里班呂傑養男」；其中呂大靜（十甲）、呂世貴（十二甲）俱為「陸柒都里長」呂傑戶下的「戶丁戶」，呂傑戶下的「戶丁戶」其他還有呂天恩（十甲）、呂子偉、呂尚二、呂尚五、呂尚十二（以上十一甲）、呂大庸、呂大峰（以上十二甲）、呂于佐（十九甲），俱為軍籍。又有王元齡、賴孔仁（以上二十甲）、林吳興（二十一甲）三戶為里班林崇養男，⁹⁹ 三戶俱民籍，戶下各止成丁一丁，耕田為業；而「林崇（二十甲），軍籍，係里班林旺戶丁」；林旺名下「戶丁戶」則除林崇外，至少尚有同住二十甲的林應統、林廷庸、林廷貫，居住捌都十七甲的林棋五、林登雲、林杞等，俱為軍籍。陸柒都內尚有「一戶葉進昌（二十一甲），係里班林洪招養男」，林洪招之名他處未見，若為林洪昭之誤，則林洪昭為軍籍林洪戶丁戶已如上述。

《嘉靖泉州府永春縣保甲文冊》中還有一戶「養男戶」與上舉八例不同都。是即居住在玖拾都第十一甲許宅村的廖世賢，「民籍，係本都里班姚文興養男」。姚文興名下的戶丁戶至少有居住在三甲院前村的姚希舜、姚崇文，二人俱為永春

⁹⁸ 關於戶丁戶，樂氏指出，明清時代戶丁一語的含意，一指一戶之下的成丁男子；二指大戶之下析產而未正式分戶的子戶；其三從賦役制度方面說，亦具有職役之意。永春保甲冊中的戶丁戶，有些在一戶之下登錄有「成丁貳丁」，說明戶丁戶並非指單丁個人，它所代表的是「當時一個大戶之下常包含眾多經濟上各自獨立的子戶」。另一方面，將戶丁視為職役的一種，乃是依據葉春及，《石洞集》（十八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四庫全書珍本》五集 363-36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3：14a，〈惠安政書二·圖籍問〉中，「力役出於力也。故身有役，為里正，為鄉老，為甲首，為戶丁，以追徵，以勾攝，以供辦正役也」（《明代黃冊研究（增訂本）》，頁 295）。就此一意義而言，里正與戶丁應為截然不同的兩種職役，但一如本文正文中所引，李欽華是里班呂大靜養男，曾宜盛是里班呂世貴養男，王永德係里班呂傑養男；單由此，可以看做是三個養男戶分別屬於三個里班戶，但再細看呂大靜與呂世貴的紀錄，呂大靜是第十甲第一戶：「一戶呂大靜，軍籍，係本都里班呂傑戶丁，成丁壹丁，耕田」；呂世貴則是第十二甲第三戶：「一戶呂世貴，軍籍，里班呂傑戶丁，成丁壹丁，耕田」。也就是說，呂大靜、呂世貴身為里班的同時，又是里班呂傑下的戶丁。這種現象同樣出現在林崇與林旺的關係上。呂大靜、呂世貴、呂傑同屬一里長戶應無疑義，三人或在不同時間先後輪充過里正之役。至於呂傑之於呂大靜、呂世貴，應為戶長與戶丁之關係。

⁹⁹ 樂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增訂本）》，頁 292，抄錄第二十一甲各戶，將吳興所屬里班名「林崇」誤作「林榮」。

縣儒學生員；另有居住在十六甲佛溪村的姚世化，十八甲的姚端華、姚文烈，十九甲柯坂村的姚端邵，各人俱為軍籍。

值得注意的是，九個養男戶皆附屬於軍籍里班戶或戶丁戶，林崇一人之下甚至有三個養男戶。諸養男戶皆以耕田為業，所耕之田應即養父戶下所有，這顯示不少軍籍戶下擁有為數不少的田產，需要靠畜養家僕為之耕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養男戶仍維持原戶籍民籍不動，¹⁰⁰ 並未因身為軍籍戶之養男而改為軍籍。¹⁰¹ 這種現象似也間接說明，這些養男應非乞養義子之屬，很可能由財買而來，¹⁰² 或許在立契過房之際，¹⁰³ 即言明過房後以耕田為業，與軍役繼承無關。由於不入軍

¹⁰⁰ 軍籍戶之養男應為軍籍，其例見上引徽州文書中之王茂戶。吳振漢，〈明代奴僕之生活概況——幾個重要問題的探討〉，《史原》12 (1982)：27-64，頁 47-48 將明代奴僕區分為官奴與一般私屬奴僕，認為「明代只有官奴在政府裡有名冊可察，至於一般私屬奴僕均已納入民籍（以征調徭役）之中，其對主人的隸屬，純係民事間的契約關係」，其說有待檢驗。查其註文，有關私屬奴僕的部分引用的是《明太祖實錄》209：5b，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官員之家役使奴婢，稽考唐制，王公之家不過二十人，官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如有多餘之數，與民一體當差」。猜想吳氏是將文中之「與民一體當差」，釋為「納入民籍」。姑不論史料原文僅限於「多餘之數」，正顯示在官方允許之役使額度內之奴僕，是可以附籍於官員之家與之同戶的；即便將範圍侷限於「多餘之數」，若各人原本分屬於軍、匠、灶籍，是否會因而被「納入民籍」，亦頗可疑。但吳氏指出政府基於征調徭役之考量，要求超額之奴僕「與民一體當差」，是否可理解為一部分私屬奴僕因此始終保留了原有戶籍，值得深入探討。

¹⁰¹ 根據鄭振滿的研究，「至遲在成化、弘治年間，福建各地的里甲戶籍已經固定化和世襲化了」，「當時永春縣的里甲戶籍和賦役負擔，實際上是由里長和甲首逐層承包的，而官府已不再實行戶籍和賦役編審」（《鄉族與國家》，頁 118-119）。軍戶養男得以保留原有民籍是否因官府怠於戶籍和賦役編審而起，仍需深入探討。

¹⁰² 按：明代中期以後，不少貧民子弟為求脫免國家稅糧徭役，選擇以「投靠」方式成為官豪地主之奴僕。永春縣保甲冊中這些軍籍戶下之民籍養男，有無可能因投靠而來呢？理論上投靠的目的既是為了逃避國家賦役，即應以隱去原有戶籍為第一優先考量，例如西村かずよ，〈明代の奴僕〉，《東洋史研究》38.1 (1979)：24-50，頁 48 註 70 引光緒《應城縣志》（羅緬、陳豪修，王承禧纂，十四卷，首一卷，據清光緒八年蒲陽書院刻本影印，《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1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1：38b，〈輿地·風俗〉即云：「明季搢紳之家，呈身服役希圖假威者頗眾，或多帶田土，冒充官戶，冀避徭役」。既云「冒充官戶」，其名應竄入官戶之下，而非保有原有戶籍。筆者因此較不傾向從這方向來思考。

¹⁰³ 義男買賣多以「婚書」名義立契，參見許文繼，〈「義男」小論〉，頁 102。汪慶元，〈明代徽州「義男」考論〉，頁 103-105 引用《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安徽省博物館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等書中有關買賣義男的契約加以分析，可參考。

戶戶籍，家主戶下人丁數不至增加，賦役負擔也不至於受到影響。¹⁰⁴ 又，嘉靖年間永春保甲冊中各戶種不分里長戶、甲首戶、戶丁戶、養男戶，戶下成丁多止記錄本身一丁，最多不過二丁，與萬曆年間吳興縣不分主戶、副戶，戶下常有數名男僕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正突顯了明中期福建地區保甲冊記載多有不實的窘狀。¹⁰⁵

其次是對「籍」的影響。以常熟南張氏為例，張氏家族在明代「登科者五，登甲者三」。三位進士分別是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的張文麟（八世），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的張京安（七世），與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的張文鳳（八世）。¹⁰⁶ 查《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三人的戶籍僅張京安、張文鳳為直隸蘇州府常熟縣軍籍，張文麟則開作常熟縣民籍。¹⁰⁷ 張京安未詳其所出，¹⁰⁸ 文

¹⁰⁴ 按：《粵大記》（郭棐撰，黃國聲、鄧貴忠點校，三十二卷，《嶺南叢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27：784，〈政事類·軍制〉有云：「舊制軍戶不許分拆，人或二十丁至三、五十丁，田或十頃至二、三十頃，遂為大戶。每遇造冊，則曰田丁多者為里長；遇徭役，則田丁多者充重役」。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95即指出，明代「戶的規模，同賦役負擔直接相關」。于志嘉，〈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頁94-96亦指出，嘉靖元年出任成安知縣的桂萼，曾強制縣內丁多田廣的軍戶分戶，目的即是均平徭役。福建南靖縣民戶被強制分戶的例子則見於陳支平，《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4），頁25。或許為此之故，丁田多的軍戶不願將民籍養子納入己戶，以免更加重了戶內徭役負擔。又，註105引葉春及，《石洞集·惠安政書·保甲名籍留縣》，指出小民懼怕保甲冊上送院道，會影響日後黃冊編造及賦役編審，因此不以實報，亦可列入考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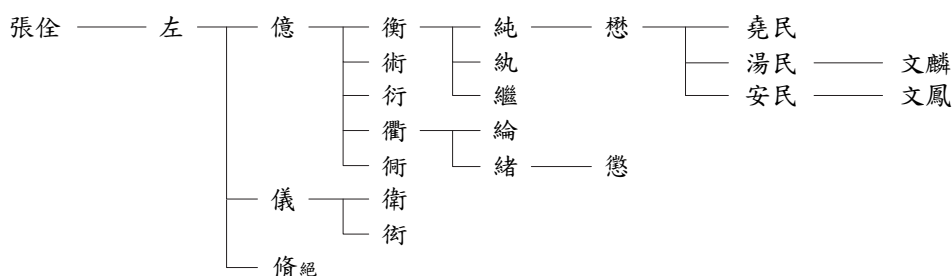
¹⁰⁵ 保甲冊所載各戶人丁數與實際不符的情況並不罕見，葉春及，《石洞集》8：13b-15a，〈惠安政書·公牘一·保甲名籍留縣〉即云：「屢蒙院道遵勘合責行鄉約保甲，……民愚不知，疑懼造黃冊將籍而役我，萬一有警，又將驅我於戎行，匿不報。按：保甲舊籍具在，不過戶一二丁，漫應上官督責，不足據」。葉春及於惠安推行鄉約保甲制在隆慶四年。在此之前，已知福建地區實施保甲制的案例，除正統十二年為對付鎮賊推行的總小甲制以外，主要實施於沿海地區，為的是因應當時海寇充斥，居民多下海通番的景況。參見三木聰，〈明末の福建における保甲制の展開〉，《明清福建農村社會の研究》（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2002），頁288-295。

¹⁰⁶ 參見《南張世譜》第一冊，〈明科名考〉。另五位舉人為張懋（正統六年應天鄉試）、張學（成化七年應天鄉試）、張仲孝（萬曆四年應天鄉試）、張大受（萬曆二十二年應天鄉試）、張國鼎（天啟四年順天鄉試）。

¹⁰⁷ 參見李周望輯，蔣元益、王際華等續輯，《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第一冊，頁514, 623, 669。

¹⁰⁸ 《南張世譜》第一冊有〈果齋公仕履考〉，果齋即京安。但譜中未記其所出，不詳待考。

麟與文鳳則俱為張衡長子張純的後人。祖父張懋，生子三，長堯民、次湯民、三安民。湯民生文麟，安民生文鳳，二人「同成化壬寅生」，¹⁰⁹ 以堂兄弟相稱，科舉應試時所報戶籍卻不相同。從中試時間來看，應與上述正德七年「歸併聽繼」事有關。



《南張世譜》無世系表，亦無世傳。張衡以下各世代資料不全，上所開列僅為簡表。張文鳳中進士的嘉靖八年，在歸併軍役後十七年，因此他以軍籍申報，聽繼的是張左名下的軍役。但張文麟中進士時歸併之例尚未訂定，他身為張衡長支之後，卻完全無視於張衡名下的軍役，自報戶籍為民籍，推其所原，應與義男應役有關。從〈充軍文冊〉的記載方式與內容來推敲，張左、張億兩名軍役均詳細記載歷次清勾的結果，張衡一役則僅載明該役由「隨營張黑子頂名補役」，對於張黑子之後究竟由何人繼補，全未說明。推想張衡名下的軍役至少到了正德年間仍由張黑子子孫繼補不缺，因此對於張純一支而言，軍役彷彿與己無關。張文麟自報家門為常熟縣民籍，極有可能在實質上已脫軍為民。

最後是對「家族」的影響。山西蒲州《孟氏家乘》中有所謂的「軍漢支」，所記即為義男子孫代充軍役者。始遷祖孟浩，字志剛，明初垛集為貼戶，後因正戶杜寬甫故絕，徙居蒲州，為蒲州守禦千戶所「成造局盔繅匠，餘丁軍籍」。¹¹⁰

孟浩徙蒲後定居蒲州，所生七子第五子夭亡，故後世分為六支。《孟氏家乘》卷三，〈行實·軍漢支〉云：

¹⁰⁹ 參見《南張世譜》第一冊，〈晚翠（湯民）公同懷授經說〉、〈書立齋（文鳳）公分俸割付後〉；第三冊，〈真齋（堯民）公墓碣銘〉、〈晚翠公墓誌〉、〈格齋（安民）公墓誌銘〉、〈端岩（文麟）公墓誌銘〉；第四冊，〈立齋公行狀〉。

¹¹⁰ 參見《孟氏家乘》（孟元芳、孟時芳等重修，孟述唐補，七卷，清順治八年跋，日本東洋文庫藏本），2：1a-b，〈籍貫〉。

家世軍籍，則軍漢當特系。特系則應承者不得規避，旁晚者不得覬覦，庶世世有定守乎。然軍不在長支而在五支者何？先是，長支為軍漢，若恃其宗子也者而不可近，宗人苦之。於是朝列公以其所為子鉉者承之，既歷四世，宗人有相安無相尤，可以軍吾宗矣，故系軍於鉉之後。

五支即第六子孟琳之後。孟琳為景泰庚午科舉人，歷官至淮安府同知。¹¹¹ 孟浩退役後，軍役原由長支繼承，但因倚恃大宗身分，對族人需索軍裝，為宗人所苦。孟琳乃以義子孟鉉繼承軍役。孟鉉之後，先後繼役的有鉉長子汝汰、汝汰三子棋、棋次子承恩；因有功於孟氏，特將其納入族譜，列於五支之下，稱「軍漢支」。

《詔安林氏世譜》¹¹² 中的西嶠「奉思堂」，¹¹³ 則是以傭人代家主從軍，後立該傭人為嗣子成立的支派。〈西嶠「奉思堂」源流概述〉云：

西嶠「奉思堂」祖源乃從東山后林四川公之孫衍派而來。后林一世祖燕公，傳四子，長子宜政，次宜文，三宜章，四宜禮。宜政公生一子名初六，因兵役由傭人代家主初六從軍，部隊開赴四川途中遇赦回籍，後被宜政公收為嗣子。傭人其原籍乃雲霄陳岱人，姓陳，本是宜政公之傭人。後成家立業。生三子，居福場村，子孫稱四川公。四川公之孫衍居詔安西嶠，生三子，派居城內、城外。建祠曰「奉思堂」。

¹¹¹ 參見是譜 3：2b，〈行實〉；萬曆《淮安府志》（陳文燭修，二十卷，據明萬曆刊本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8，上海：上海書店，1990），2：25b，〈秩官表〉。

¹¹² 《詔安林氏世譜》（林坤木主編，福建省詔安縣《詔安林氏世譜》編委會刊印，2004）係二〇一〇年六月間，本人為執行國科會「明代軍戶家族研究」計畫，隨同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哈佛大學宋怡明教授、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院兩位副院長黃挺教授、陳海忠教授，以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李慶新教授、中山大學博士後楊培娜等人，赴閩粵沿海地區衛所遺址進行田野調查時，於玄鐘所（今福建省漳州市詔安縣梅嶺鎮）東門村林海明先生處訪得。感謝林先生慨然提供，眾人協力拍攝，並得鄭教授好意，回臺後始能利用。

¹¹³ 《詔安林氏世譜》為聯宗譜，第四章〈詔邑開派〉收載惟福公支派、「林氏家廟」支派、文康公支派「南陂」、景春公支派「金溪樓仔」、西嶠「奉思堂」支派、秀篆埔坪樟溪渠「種玉居」支派等六大支派，其中之林氏家廟「思成堂」雖亦以惟福公為肇基開族始祖，但其下尚有永春派真公世系、漳浦港頭林氏世系、竹港「燕翼貽謀堂」及雲霄官宅「永思堂」等，皆係以同宗名義聯宗者。參見是譜頁 270-273，〈詔安林氏家廟概況〉。是譜有關西嶠「奉思堂」支派的記事非常簡略，一世祖燕公與惟福公關係不明，詳下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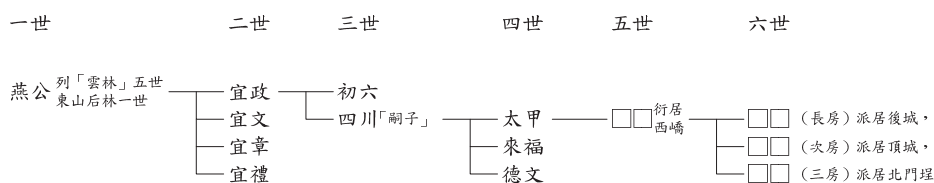
四川公本姓陳，為林宜政傭人。宜政僅一子名初六，四川公代初六從軍，¹¹⁴ 後遇赦回籍，時初六或已不存，宜政乃收之為嗣子。其子孫遷居詔安西嶠，開派「奉思堂」，與惟福公支派並列詔安林氏六大支派之一。

四・結論

明代以軍戶世襲衛所軍役，設軍政條例以規範軍戶戶內繼補軍役人選。為免軍戶藉財買家人、義男冒頂精壯戶丁，以致隊伍不精，軍政條例要求作弊者改正歸宗，違者，官吏依律坐罪，正軍全家調發別衛充軍，頂替之人就收本衛補伍。但對於正軍戶下僅存老弱殘丁者，為使軍役延續不斷，又允許以少壯義男及同籍女婿收補，顯示國家對軍戶戶內畜養家人、義男的現實狀況，採取了默認的態度。另一方面，衛所武官畜奴是國家授予的合法權益，世襲武官與世襲衛軍之間也常形成私的隸屬關係，加上自願帶丁糧投靠衛官者不在少數，衛官畜奴更是常態。

衛選簿中不少以家人、義男承充軍役的紀錄，特別是在元末明初動亂之際，常見被指名充軍之人為逃避軍役，以義男頂替自己姓名充役，繼而又以義男之子「戶名不動」繼役的情況。義男或其後代一旦因功陞為武官，常申請復姓獲准，以此斷絕義父子孫爭襲武職的機會。當然也有以義男補役不成，被要求以正軍戶丁改正的事例。此時為示懲戒，頂名代役的義男不得因之而免役，軍戶投機不成，反而折損了一名人力。

¹¹⁴ 四川公生存時代不詳，《詔安林氏世譜》，頁 297 有「奉思堂」世系表：



指出「奉思堂」一世燕公為「雲林」五世，但遍查該譜，不見有關「雲林」之記事。查該譜頁 174-177，〈林氏詔邑開派世系傳略〉，開詔始祖惟福公生於南宋理宗紹定五年，終於元成宗大德八年。傳至五世，可考者南生公、整林公、元熹公，為元末明初人。南生公生於元順帝至元二年，終於明洪武三十一年；被列為雲林五世的燕公若與之同輩，當亦為元末明初人。南生公長子六世至德公於洪武九年充當遼東瀋陽衛（族譜誤作潘陽衛）軍，東山后林三世的四川公代初六充軍或在洪、永間。不詳待考。又，同譜頁 229-230，〈「六德堂」世系傳略「徑尾」〉記惟福公支派十四世某，「開派西嶠，建祠曰『紹德堂』」，與「奉思堂」不同支。

再從家譜中的實例來看，由於軍戶同時需要承擔軍、民二役，負擔特別沈重，更加重了對家人、義男的需求。例如安徽桐城含山伍貴，本身生有五子，但面對明初抽軍，先以家人子來興應役，繼而將一旦放出的家人二潘一孔召回，將田產品作八股，均分予五子及二潘一孔，目的就是要家人子孫世世輔佐伍氏，共同承擔軍、民二差。後因八股人丁或盛或衰，又以合同議約方式併為五股，各股應負義務都以明文規範，這種關係並且一直延續到清初皆未改變。

常熟南張氏則自張左以下，祖孫名下共有四名軍役。除早先因入道籍出戶的張道衍以外，張左、張億、張衡充軍時皆曾攜義男偕往，或替出本人留義男在衛承役。張左絕戶後，衛所清軍官更回義男原籍，勾出與張氏並無瓜葛的義男親姪補伍。張億亦因所餘三子俱無意當軍，除覓人替當軍役之外，令二子出贅，僅留一子在戶，以子孫承襲軍役。張衡更在代充軍役的義男之外，養有數名義男協助理。從張衡留下的遺囑可知，他所收留的義男，有出身軍籍逃戶的，也有本身就是逃軍的。

司門前周氏呈現的，則是衛所武官家族大量畜養家人的現實。這些家人的來歷，除朱姓係陪嫁而來，其餘因族譜不載，未知其詳，但應不乏自願投獻土地者。從周瑞為四子所立的分關書中，可以看到繼承武職的長子名下，分得祖傳五大房及朱姓全房之外，另有家人三名；其餘三子則各得家人五房及一大房。這些家人分住在益陽、湘潭、甯鄉、長沙、善化五縣各地，負責幫貼差操、認納茶錢，供送鮮魚、燈油銀、新米、雞鵝及幫官盤費等，另提供祭祖塋時所需大船，及慶弔時所需人役。由家人居住地點多緊鄰市鎮，或與周瑞田產所在地吻合，推想他們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為家主管理田產。部分家人或也參與農作物、漁產的買賣。

家人、義男皆可視為擬制性的家族成員，在明代的戶口清查中，義男是作為家庭正式成員登記在冊的，自宜與家主擁有同樣的戶籍。含山伍氏戶下的二潘一孔，與伍氏諸子以戶股的形式結合，他們在各種賦役黃冊上，應該是以伍潘某、伍孔某的名字登記，與伍氏共同承擔軍民二役，也同樣被劃歸軍籍。比較奇特的是，嘉靖年間福建永春縣保甲冊中，軍籍里班名下的義男仍能保有原有民籍，這種現象究竟如何形成，具有何種意義，實需進一步的探討。

軍戶以義男代役，藉機脫軍為民的情況，在族譜中也有所體現。也有軍戶為感謝義男代役，將其本人、後代列入族譜，視為嗣子、族支的狀況。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知道，明代軍戶中家人、義男對軍戶軍、民二役的承充常擔負起重要任

務，從而促成軍戶戶籍乃至家族結構上的變化。而含山伍氏、常熟南張氏以及詔安林氏的例子，似乎顯示明初黃冊里甲制度因為以核心家庭為戶的單位，各戶人丁數偏低，面對沉重的軍役民差，軍戶對家人、義男的倚重程度相對偏高，家主與家人、義男間時而呈現相互依存的關係。¹¹⁵ 中期以後軍戶家族呈兩極化發展，因逃亡故絕形成缺役者雖多，也有不少軍戶限於不得分戶之令，發展成為里長大戶。¹¹⁶ 大家鉅族中奴僕與家主的關係是否還似明初一般，值得進一步觀察。期望未來能透過更多個案研究的累積，深化吾人對明代軍戶的認識。

（本文於民國一〇〇年六月二十日收稿；同年十二月十五日通過刊登）

¹¹⁵ 按：小山正明，〈明末清初の大土地所有—特に江南デルタ地帯を中心として—〉（一），《史學雜誌》66.12（1957）：1-30，認為明代的奴僕是「隸屬於強固的家父長支配下的，典型的家父長制的奴隸」（頁12）。對此，細野浩二，〈明末清初江南における地主奴僕關係—家訓にみられるその新展開をめぐって—〉，《東洋學報》50.3（1967）：1-36，以家訓為主要材料，主張明末清初期的江南地區，由於奴僕之經濟、身分地位上升，地主奴僕間出現新的秩序體系，過去強調「主僕之分」的單向支配形式逐漸後退，形成一種「相資相養」的關係。吳振漢，〈明代的主僕關係〉，《食貨月刊》復刊12.4/5（1982）：27-43，亦駁斥大多數中日學者過於強調家主對奴僕進行強制性剝削的看法，認為明代主僕關係大多建立於彼此「相資相養」的基礎上。從本文所舉有限的個案來看，至少在明初以核心家庭為主體的軍戶家族中，由於軍戶家主需同時面對自家生計與軍民二差，在戶內人丁數稀少的情況下，對奴僕的依賴性相對較高。並且因軍戶家主對於奴僕勞役的需求，不限於農工商勞動或家務勞役的範疇，有時更用之於衛所軍役的承當，其主僕間相互依存之關係，或更在一般民戶之上。從常熟南張氏收養的奴僕中，不乏逃軍、乞丐之流，不難想像這種相互依存關係的形成，與國家對軍戶的勞役剝削關係較大，與奴僕本身經濟、身分地位的高下無關。另一方面，如司門前周氏這類的武官家族，由於「通族家丁繁眾」，到了明末清初期，「或因主幼懦而悍僕欺凌，或分彼此而縱僕犯上，或因伴交關而禍及主人，或酗酒無故凌辱主輩」，彼此間的關係就很難以「相資相養」稱之。只能說狀況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¹¹⁶ 參見于志嘉，〈論明代垛集軍戶的軍役更代〉，頁69-70 註77。其例見樂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增訂本）》，頁185, 197-198。

于志嘉

後記

本文於二〇一一年六月投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得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復於修改期間，獲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邀請，參加「第三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同年十二月十一日於會中宣讀，得鄭振滿、程美寶、徐斌、卜永堅、黃忠鑫諸先生指正。謹此一併致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嘉靖泉州府永春縣保甲文冊》，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藏。
- 山根幸夫解題，《皇明制書》，東京：古典研究會，1966。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尤鼎等修，尤雲章纂，《尤氏閩浙蘇常鎮宗譜》，據清乾隆四十八年遂初堂刻本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42，北京：線裝書局，2002。
- 尹繼善等修，黃之雋等纂，乾隆《江南通志》二百卷，首四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07-51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王世茂，《仕途懸鏡》八卷，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天啟年間梅墅石渠閣印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捲。
- 王圻，《續文獻通考》二五四卷，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曹時聘等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類書類》185-189，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
- 永瑤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萬有文庫版本印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伍受禔等修，《伍氏宗譜》，清同治七年思遠堂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縮微膠捲。
- 安徽省博物館編，《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 吳兆熙等續修，張先掄等纂，光緒《善化縣志》三十四卷，首一卷，清光緒三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線裝書。
- 吳賓彥修，王方歧纂，康熙《廬江縣志》十六卷，據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影印，《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20，北京：中國書店，1992。

于志嘉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二十五卷，首一卷，續集一卷，據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影印，《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1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呂坤，《新吾呂先生實政錄》七卷，據明末影鈔本影印，《官箴書集成》1，合肥：黃山書社，1997。

李周望輯，蔣元益、王際華等續輯，《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

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萬曆《大明會典》二二八卷，據明萬曆間司禮監刊本影印，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

李芝、段玉裁等纂，乾隆《富順縣志》二十七卷，首一卷，據清光緒八年重刻乾隆四十二年本影印，《西南稀見方志文獻》15，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李培修，黃洪憲等纂，萬曆《秀水縣志》十卷，據明萬曆二十四年修民國十四年金蓉鏡校補鉛印本影印，《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3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

周義和等主修，《司門前周氏四修族譜》十二卷，1924年汝南堂木活字本，上海圖書館藏。

孟元芳、孟時芳等重修，孟述唐補，《孟氏家乘》七卷，清順治八年跋，日本東洋文庫藏本。

林希元纂修，嘉靖《欽州志》九卷，據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十八年刻本重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64，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1。

林坤木主編，《詔安林氏世譜》，福建省詔安縣《詔安林氏世譜》編委會刊印，2004。

林堯俞等纂修，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一百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97-59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姚思仁注，《大明律附例注解》三十卷，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藏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叢書·明清史料叢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范涑修，章潢纂，萬曆《南昌府志》三十卷，據明萬曆十六年刊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810，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徐永言修，嚴繩孫纂，康熙《無錫縣志》四十二卷，清康熙二十九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

- 秦聚奎修，萬曆《漢陽府志》十二卷，東京舊上野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捲。
- 國家圖書館分館編，《南張世譜》不分卷，據清乾隆間刻本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39，北京：線裝書局，2002。
- 常琬修，焦以敬纂，乾隆《金山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據清乾隆十六年刊民國十八年重印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405，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2。
- 郭棐撰，黃國聲、鄧貴忠點校，《粵大記》三十二卷，《嶺南叢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 陳文燭修，萬曆《淮安府志》二十卷，據明萬曆刊本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8，上海：上海書店，1990。
- 陳有年，《陳恭介公文集》十二卷，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陳啓孫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352-135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陳莫鑲等修，倪師孟等纂，乾隆《吳江縣志》五十八卷，首一卷，據清乾隆十二年刊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163，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黃彰健校勘，《明實錄》，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捲影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黃彰健編著，《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
- 楊一凡主編，蔣達濤副主編，《皇明條法事類纂》，《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 4-6，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 葉春及，《石洞集》十八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四庫全書珍本》五集 363-36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 廖大聞等修，金鼎壽等纂，道光《桐城續修縣志》二十四卷，首一卷，據民國二十九年重排印清道光七年刊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242，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劉俊文總纂，《中國譜牒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研製，許可證持有人：中央研究院。
- 劉時俊撰，孔貞時輯，《居官水鏡》四卷，據明萬曆刊本影印，《官箴書集成》1，合肥：黃山書社，1997。
- 霍冀撰，《軍政條例類考》六卷，據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于志嘉

羅炘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二十四卷，據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明崇禎十年刻本影印，《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羅緬、陳豪修，王承禧纂，光緒《應城縣志》十四卷，首一卷，據清光緒八年蒲陽書院刻本影印，《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1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譚綸等輯，《軍政條例》七卷，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捲。

蘇佳嗣纂修，康熙《長沙府志》二十卷，據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影印，《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37，北京：中國書店，1992。

龔詡撰，《野古集》三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3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二·近人論著

于志嘉

- 1986a 〈從衛選簿看明代武官世襲制度〉，《食貨月刊》復刊 15.7/8：30-51。
- 1986b 〈試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4：635-667。
- 1987 《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1993a 〈再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幾個個案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639-678。
- 1993b 〈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戶遷徙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35-174。
- 2003 〈明清時代軍戶的家族關係——衛所軍戶與原籍軍戶之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1：97-140。
- 2005 〈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頁 80-104。
- 2006 〈再論垛集與抽籍〉，《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頁 197-237。
- 2009 〈論明代垛集軍戶的軍役更代——兼論明代軍戶制度中戶名不動代役的現象〉，《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35-85。
- 2010 〈明代江西衛所軍役的演變〉，《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52-199。

牛建強

- 2002 〈明代奴僕與社會〉，《史學月刊》2002.4：98-107。

王毓銓

- 1965 《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

王鶴鳴主編，上海圖書館編

- 2008 《中國家譜總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鶴鳴等主編，上海圖書館編

- 2000 《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吳振漢

- 1982a 〈明代奴僕之生活概況——幾個重要問題的探討〉，《史原》12：27-64。

- 1982b 〈明代的主僕關係〉，《食貨月刊》復刊 12.4/5：27-43。

杜信孚、杜同書著

- 2001 《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北京：線裝書局。

汪慶元

- 2004 〈明代徽州“義男”考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1：100-106。

周良霄

- 1982 〈明律“雇工人”研究〉，《文史》15：75-90。

韋慶遠

- 1961 《明代黃冊制度》，北京：中華書局。

張偉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

- 1976 《中國法制史書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梁方仲

- 1950 〈明代黃冊考〉，《嶺南學報》10.2，收入《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264-300。

許文繼

- 2002 〈“義男”小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4：101-104。

陳支平

- 2004 《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

傅衣凌、陳支平

- 1987 〈商品經濟對明代封建階級結構的衝擊及其夭折——讀惠安《駱氏族譜》兼論奴變性質〉，《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 1-16。

于志嘉

黃彰健

- 1977 〈明洪武永樂朝的榜文峻令〉，《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237-286。

楊一凡

- 1988 〈四編《大誥》所反映的明初社會〉，《明大誥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 144-160。
- 1992a 〈《大明律》考〉，《洪武法律典籍考證》，北京：法律出版社，頁 1-68。
- 1992b 〈重典治吏考〉，《洪武法律典籍考證》，頁 105-115。

蒿峰

- 1988 〈明代的義男買賣與雇工人〉，《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科版）》1988.4：107-113, 83。
- 1989 〈試論明代奴僕制度〉，《烟台大學學報（哲社科版）》1989.1：89-94。

劉志偉

- 2010 《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鄭振滿

- 2009 《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韓大成

- 1983 〈明代的奴婢〉，王仲荦主編，葛懋春編輯，《歷史論叢》第 4 輯，濟南：齊魯書社，頁 272-303。

樂成顯

- 2005 〈明清徽州宗族的異姓承繼〉，《歷史研究》2005.3：85-96。
- 2007 《明代黃冊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初版。

三木聰

- 2002 〈明末の福建における保甲制の展開〉，《明清福建農村社会の研究》，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頁 288-295。

小山正明

- 1957 〈明末清初の大土地所有—特に江南デルタ地帯を中心として—〉（一），《史學雜誌》66.12：1-30。

山根幸夫

- 1966 《明代徭役制度の展開》，東京：東京女子大學學會。

西村かずよ

1979 〈明代の奴僕〉，《東洋史研究》38.1：24-50。

1983 〈明末清初の奴僕について〉，《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 233-275。

高橋芳郎

1972 〈明末清初期、奴婢・雇工人身分の再編と特質〉，《東洋史研究》41.3：60-85。

1993 〈明代の奴婢・義子孫・雇工人—萬曆十六年新題例の前提—〉，《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中國の傳統社会と家族》，東京：汲古書院，頁 107-127。

細野浩二

1967 〈明末清初江南における地主奴僕關係—家訓にみられるその新展開をめぐって—〉，《東洋學報》50.3：1-36。

濱島敦俊

1982 《明代江南農村社会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于志嘉

Adopted Family Members within Ming Dynasty Military Households

Chih-chia Yu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garrison military service was passed down through military households, and military ordinances were established to standardize who within a military household could inherit military service. Military ordinances included both prohibitions and compromises regarding adopted family members who took over military service on behalf of someone in their household, the continu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always the primary goal behind regul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mainly on clan genealogies, while also utilizing records from guard appointment books as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The work also integrates records about adopted family members in military households taken from Yellow Registers of Taxes and Services (*fuyi huangce* 賦役黃冊) and Baojia Registers (*baojia ce* 保甲冊) consul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wa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discover the influence adopted family members had on the Ming dynasty militar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even on clan structure.

Keywords: Ming dynasty, military household, adopted family member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lan